

【论 文】

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¹

杨圣敏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在 2011 年 12 月 14 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中主要就新时期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研究中和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学科界线与学科规范问题，客观性的问题，汉民族研究问题，后现代与学术创新的问题。

关键词：民族学、人类学、界线、创新

新时期以来,与全国各界的发展同步,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并已历史性地进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在学界的进步中仍存在不少急待大家努力克服的问题。下面就其中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 学科界线与学科规范

1. 学科界线模糊的现状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在 1950-70 年代一直受到冷遇并被相继撤销,1978 年以后开始重建。人类学民族学自重建以来,学科界线模糊的问题在研究规范、研究领域、机构设置和人员划分等方面造成长期的困扰。对于那些希望推进民族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性的部分学人来说,更是一直耿耿于怀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因此,30 年来不断有相关的研讨会召开,相关专题的论文发表,在诸如广义民族学与狭义民族学、民族学与民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民族学的关系、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等问题上各抒己见,却至今难以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这种讨论已引起国外关注中国民族学的多位著名学者发表文章给予评议。²其看法与国内学界又有较明显的差异。国外多数人的看法是从学理上分析,认为这不难辨清,没必要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界线问题却不仅是学理辨别的工作,它与历史的影响、资源的分配、机构的设置等诸多因素有关。

首先,我们根据作者本人的考察和亲身经历,以及李绍明先生在其论文中提供的相关材料,回顾一下六十年来民族学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文件中所划分的学科归属情况³:

¹ 本文刊发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² Stevan Harrell. The Anthropology of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 of Recovery and Progress in China[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1,30: 139-161; Maurice Fr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1,40(2): 345-347; David Y.H.Wu. Chinese National Dance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vization in Chinese Anthropology[J].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Berghahn Books,2004: 198-207.

³ 李绍明.关于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1).作者本人自 1990 年代中以来多次参与了教育部相关问题的专家组讨论并长期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949年以前，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名称曾长期同时在中国使用。这种情况最初是由于译自西方不同的国家和语言造成的。国际学界的通识是，一般来说，欧洲大陆德、法、俄罗斯等国的民族学，就相当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因为这个学科都是来自西方，所以往往有类似中国这种同时存在两种称呼的情况。

在20世纪50年代初，各高校中自称“人类学”的专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科而遭撤销。自称“民族学”的专业因与苏联学科名称相同而得以保存，受苏联学科分类框架的影响，被归入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成为二级学科民族学。当时中国高校中唯一的民族学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为原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副主任陈永龄）就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系主任为历史学家翁独健，副主任为原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1964年该教研室被改称为民族志教研室，此后民族学在国内高校中就完全失去了独立学科的名称和位置。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的提议，国家教委将民族学划归法学，属于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林先生提此建议的初衷是希望尽快与历史学科划清界线并参照了西方的一些划分方式。¹今天看起来，这样的划分也未必完全合乎学理。

1990年，在国家教委核定的学科专业设置中，民族学仍为法学下的二级学科。

1993年7月1日，国家教委的文件再次将民族学本科专业归入历史学中。同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核准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又将民族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其中包括民族问题理论、民族语言、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民族史、民族经济、世界民族等共六个二级学科。

1994年3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关于学科划分的分类，将民族学列为一级学科，其中包括八个二级学科，即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蒙古学、藏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学其他学科。

1995年，费孝通先生提议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科并立为一级学科，他说，如果大家同意这个意见，由他出面去与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交涉。但他的建议遭到部分民族学界人物的反对而未果。²

1996年，教育部文件中将人类学列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

2010年夏，在国务院学位办召集的高校专家会上，多位专家提出了将本科目录中的民族学脱离历史学的建议，当年教育部接受这个建议将民族学在本科目录中单独列为一级学科。

2011年6月，在教育部召集的资深专家会上专门研究了本科目录中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来自9所全国重点高校的全部9位专家中有7位赞成这样的意见：民族学与人类学是一个学科，今后在教育部公布的目录中不再同时出现这两个学科名称，目录中只用“民族学”一名，不再出现“人类学”称呼。（但各高校如自称人类学，可自便）。³

2011年，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民族学组9位成员一致同意如下的目录修改意见：将原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人类学划入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目前这项建议能否实现还在讨论之中。

以上所介绍的历年来政府主管部门这些不同的划分法，显然即自相矛盾，又有多处不合学理。如，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划分实际上是将民族学划分为由多个学科组合成的学科群，成为“少数民族学”⁴。将这些学科都统称为民族学，实际上反而没有了民族学的地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文件又将民族学所属范围称为“民族问题研究”，实际上是将不同范畴的学科和研究专题拼凑于一处，将民族学等同于“民族问题研究”，实际上就否定了民族学本身独立的学科性质。

¹ 根据当时参与相关会议的王庆仁教授的回忆。

² 杨圣敏. 费孝通先生：民族学发展的指路人[J]. 西北民族研究, 2007(1).

³ 笔者参与了该次会议。

⁴ 李绍明. 关于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问题[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6(1).

国家管理部门对民族学这种学科划分上的混乱，实际上是民族学界内部学者和单位之间意见分歧的反映。如果想从学理上分清是非，其实并非难事，但至今没有这样做说明了学理之外原因的存在。学科的划分不仅关系到学理，还关系到不同学术单位、学术团体甚至个人的学术资源、地位甚至前途。因此问题就比较复杂，也就更难解决。

民族学学科界线模糊，还与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有关。

2. 同时创建于西方多国

在国际学术界，与传统学科如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比较，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是很年轻的学科。它们是在 19 世纪以后，在欧美多个国家几乎同时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受各国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至今在欧美各国仍没有就学科名称、定义和研究范畴等方面达成完全的统一。

民族学在英国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在美国被称为“文化人类学”，一般来说，现在这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美国和英国的学者仍没有就彼此对学科的解释完全互相认同，他们都认为各自对学科研究的领域和定义还有一定差别。美国的人类学传统上分为四支：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或叫生物人类学）。但在其他多数国家，语言学是一门单独的独立学科。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考古学一直与历史学接近或直接合在一起。

在欧洲大陆，如德、法等国，对于英美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称呼在传统上叫做“民族学”。汉文的“民族学”一词，是蔡元培先生译自德文“Völkerkunde”（德文写法为 Völkerkunde 或 Ethnologie）。实际上，德国人传统上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研究有一个独立的称呼：Volkskunde，有时候被翻译成“民俗学”，也有人将其翻译成“民族学”。因为“Volk”是“民族”或“人民”的意思，是民族的单数形式，而“Völker”也是“民族”或“人民”的意思，是民族的复数形式。后缀“kunde”是“研究”的意思。这两个词如果直译都应该是“民族研究”或“民族学”。但单数的民族研究表示对本民族，也就是对德国日尔曼民族的研究，复数的民族研究指的是对国外民族、异民族的研究。德国的民族学与美英的人类学传统一样，都是研究异民族的学科，民俗学则研究本民族。欧洲大陆的波兰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之间，对这个学科的定义和学科领域都有类似的一些区别，至今仍是如此。在欧美以外，也有很多国家，这类研究都存在于社会学系或被称为“文化研究”。换句话说，民族学这个研究领域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归类是不统一的，是有些混乱的。

一百年前，当分别去欧美各国留学的中国学子回国后，就各自带回了源自西方又互不相同的称呼和定义。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往往也有类似的情况。当时，自德国留学归国的蔡元培自然将其翻译为德国使用的“民族学”，而且他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尊，推行这个称呼于全国学界。而在美国人兴办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吴文藻（燕京社会学系主任）和潘光旦（清华社会学系主任）等人则一直使用人类学一词。

3、学科的开放性特点

实际上，在各种学科中比较，民族学或人类学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科。也就是说，它是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开放的学科。这是民族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它的研究要求借用几乎其他所有学科的知识，既包括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的，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它的研究越深入，这种借用的需求就越多。现在，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学分支学科陆续涌现，例如，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民族学（心理人类学）、法民族学（法人人类学）、教育民族学（教育人类学）、语言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政治民族学（政治人类学）、经济民族学（经济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生态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生物民族学（生物人类学）、医学民族学（医学人类学）等；与技术有关的如计算机民族学（计算机人类学）、影视民族学（影视人类学）等；与人文科学有关的如文学民族学（文学人类学）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而且还会不断增加。为什么民族学、人

类学有这样一种开放的特点呢？因为它研究的是人、人群、人群的文化，所以与人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和探究。人本身和人群的文化是一个太复杂的研究领域，不言而喻，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观察、分析，才可能有更准确深入的解释和判断。

所以实际上我们不能指望对此学科领域有国际上完全的一致性定义。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地区或学派往往在研究领域或研究角度上各有自己传统上的偏重。有的时候，当不同学派、国家、地区的学者要坐在一起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特别是在召开国际性会议的时候，为了会议名称和编制会议议程的方便，就使用大家比较认可的同一个称呼。也有的时候，当实在难以完全统一名称时，就同时使用两个称呼，如“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和称呼。所以不同称呼会长期保持下去，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尽管西方各国对民族学人类学各有不尽相同的定义，在研究领域中各有侧重或不同，但有两点是肯定的：（1）各国学者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上是相通的，是同一套理论；（2）各国学者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方面、基本方面也是相通的，是同一套方法。所以民族学的开放也是有其底线的，即只有那些能够遵循或承认这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才是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学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因此我们还是认为，前述我国教育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等主管部门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分类还是存在混乱和不合学理之处，如将蒙古学、藏学等研究专题或综合研究领域与民族学这样的学科并列为二级学科；把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和民族经济研究这种本来应分属于政治学 and 经济学之下的一个研究领域也列为一二级民族学学科下与二级民族学并列的二级学科，都是不合适的。其后果是将使民族学失去其学科特点、学科规范和学科理论而成为一个综合研究领域“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所以，进一步调整国家有关学科分类的规定还是很有必要的。

4. 学理之争还是资源之争

如上所述，在中国同时有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名称，最初是由于译自西方不同的国家和语言。¹在欧美国家尽管称呼各异，但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名称的争议，因为每个国家在国内都沿用自己传统的同一个称呼。但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因为这个学科都是来自西方，所以都往往有类似中国这种同时存在两种称呼的情况。如在日本国内，也是同时有这样两个名称。日本学界一些人认为，日本民族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个案和深描，人类学则更重视对案例的对比分析，也更国际化。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和中国国内都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争论不休。

1994年，日本民族学界有人提议将“日本民族学学会”的名称改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主要的理由是，在大学和研究所里，用人类学的名称更好确定课程和研究课题的名称，也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再者，用人类学名称会让更多人认同这个学会。这个提议是在日本民族学会接待了一个大型国际人类学会议以后，很多人希望日本的民族学更国际化，与国际接轨。²当时日本民族学会的会长说，民族学这个名称太陈旧，这个名称已不能代表这个学科实际的研究领域的性质，而且现在日本多数大学的课程和研究所的研究都已改用人人类学这个名称。但支持和反对改学会名称的两派人争执不下，1994年10月学会召集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反对改名的人以超过50%的微弱多数票获胜。反对者的理由其实并非是学理上的，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如果扔掉已经用了60年的民族学名称，就等于否定60年的学科历史，特别是，如果民族学改为文化人类学，它就成了人类学之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等于降低了学科的地位，民族学家们的个人名誉地位也会因此而受损失。同时，多数人也不愿意看到该学会分裂为两个学会，不希望分裂为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两支队伍，那样对每个人都有不利的一面，那时个人的研究范围可能会

¹ 例如，德国最著名的马普民族学研究所挂着英、德两种文字牌子，德文写成“Institut für Ethnologie”即“民族学研究所”。同时，牌子上的英文写成“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即“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² Aoki Tamotsu. Hangakumon no susume[M]//Recommending semi-scholarship.in Bunkajinruigaku no susume. Invitation to Culture Anthropology. ed, Funabiki Takeo. Tokyo: Chikuma Shobo, 1998: 64-74.

被限定在民族学或人类学里，也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失去在更大范围内从事研究的可能性。这样，日本民族学会更名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¹日本学界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两个名称和名称之间关系的争论，让我们看到，这主要不是一个学理的争论，而是出于不同学术团体、单位和个人的资源、利益和名誉等方面的考虑。到了2006年，日本学界再次召集针对这个问题的研讨会，终于通过了将名称统一更改为人类学会的决议。

中国学界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到底是一个还是不同的两个学科的争论也持续了多年，与日本的情况类似，其实主要也不是学理的争论。有国外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争位子”的辩论，是已“走入死胡同”的辩论，从学理上看是没有意义的。²

老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明确的态度。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地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³

实际上，这几个学科在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独立发展，现在已逐渐走向互相的渗透与联合。如，在西方有的大学，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建为一个系，称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国际学术界早已将其基本归为一类。费孝通先生在1992年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后说，这三个学科构成了一条江水，“我们都是同饮这条江水的人”。“这三个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三科是一个集团，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⁴

一百多年来，这几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更多地转向对现代社会、主流社会的研究。而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又推动这种研究不断扩大地去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不断互相交叉与联合来研究共同的问题。⁵这都提醒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将日益走向联合而不是更清楚的分界。

5、研究规范问题

自1949年至198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学专业一直以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特别是1960年以后的十几年，民族学专业实际上被“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工作”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所取代。换言之，民族学专业曾蛰伏于“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名义之下十几年。当新时期来临，民族学恢复名誉和学科地位以后，过去十几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队伍一变而为民族学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包括了各种学术和职业背景的成员。1978年学科重建以后，民族学专业大多设于全国各所民族院校中，所以仍长期被视为“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学科，学科界限仍模糊不清。这导致仍有部分学者在研究资料的搜集中缺乏专业方法，特别是缺乏田野调查的规范。2000年以后，在中国民族学界部分学者的研究已走向国际前沿时，国内仍有不少作品在“广义民族学”名义之下发表。这类作品往往缺少专业理论的视角，造成泛泛而谈，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宏观分析的作品多，文献材料利用多，而有较深入的中观和微观理论分析及第一手实地调查材料支撑的作品少。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研

¹ Sidney C.H.Cheung. Japanese Anthropology and Depictions of the Ainu[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36-151.

² Xin Liu. Past and Present: Two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52-183.

³ 费孝通. 人类学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M]//转引自乔健, 中国人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载杨圣敏主编. 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03.

⁴ 杨圣敏, 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M]//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57.

⁵ Xin Liu. Past and Present: Two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52-183.

究方法和学科理论。学界多数学者公认，中国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因此，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规范民族学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学科规范，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是今后民族学研究走向规范化和提高研究队伍质量的必由之路。

二、 客观性的问题

1、客观性与狭隘民族情绪

近年来中国民族学界在多项研究中都进入了比以往更深入的讨论，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比较激烈，很多学者的研究更贴近当代社会实际问题，特别是比较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这是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积极表现。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够健康的倾向，即在辩论中有少数人缺少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中性的态度，在辩论的文章中过多使用激烈夸张、情绪化的言词；也有学者在辩论中不能很好辨别自己所用证据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使得讨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而无助于问题之解决。

当前，在部分学者的观念中仍有过多的禁区，对有些民族方面的问题，自己不去研究，也反对其他人对传统观点的重新审视和探讨。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应该提倡“学术无禁区”的原则，即便有些不宜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观点，还是可以内部讨论或开辟内部刊物和上报政府以供参考的渠道。

在国际学界中比较，中国的民族学界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学者，这有利于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研究。近年来，在学术研究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情势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也更多更深入地介入当代现实的边疆和民族问题。这本是一个好的趋势，但在国际国内某些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数学者将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狭隘的民族观念带入学术研究之中，在研究与本民族有关的问题时，不能始终坚持以事实为准绳的原则，甚至个别人排斥其他民族的学者研究本民族。这对学术研究和民族团结都是不利的。

2、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我们这种社科研究工作虽然是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服务的，但既不是从属于政治工作也不代替政治工作。我们的政治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政治，它必须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办事。人类学固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它只提供对客观事务的认识。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决定的则是实际的政治工作者。”¹

在任何时代和社会中，科学本身是一定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会受到社会中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政治对它有较大影响。但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学科的健康发展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国际民族学界也有很多相关的总结。²

实际上，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学界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开展独立的研究，提出以此为基础上的独立看法或判断，虽然其中有些判断不一定完全准确，有的甚至是比较片面的，但我们的社会需要听到学界的声音。学界的独立研究也是我们的政府可以参考的另一个角度的意见。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开展独立的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的社会价值，也是学界的社会使命。

三、汉民族研究问题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历史上曾经是以研究殖民地的“异民族”，研究所谓“初民社会”为主要

¹ 费孝通.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M]/民族与社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² 参见 Jan Van Bremen & Akitoshi Shimizu.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M]. Curzon Press, 1999: 405.

对象的学科，但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很多学者对全球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进行分期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称为“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甚至有人直接称之为“殖民主义的人类学”。二战以后，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全球性地逐渐转向研究本国、本地、本民族、复杂社会和发达社会。因为已经没有原来那种殖民主义的政治目标，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现代和纯学术的人类学”。又由于其研究对象大量转向本土，所以又被称为“地方性的”、“多样性的”人类学。有人预言，未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将是在地方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球性人类学、民族学。¹可见，从研究领域上来看，研究本土、本民族、主体民族，研究城市、现代社会，已逐渐成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其主要扎根和生存的土壤，历史上殖民地曾经是民族学产生和生长的土壤，但二战结束后，这个土壤已经逐渐变成本土，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还在二战结束以前，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此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²当代也多有学者认为“在本土研究可能更容易接近真理”。³

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领域，曾经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并重。全国解放以后，人类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撤销，民族学则完全转到以少数民族研究和教学为主的民族院校，加上民族学界的学者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民族工作，民族学遂被误认为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和“修正主义民族学”的风潮使得民族学基本被民族问题研究所取代，也可以说，当时民族学只能蛰伏于民族问题研究之中。现在，当历史已经拨乱反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将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局限于少数民族了。而且几千年来，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不可分，如今更是如此。所以，一个将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剥离出去的民族学，也很难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有很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这对学科的发展和民族研究本身都是不利的。

四、后现代与学术创新

1、步西方后尘的现状

人类学、民族学是一个世纪前传自西方的学科，至今我们在这个学科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仍然基本沿袭西方学界，一百年来，我们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的后尘，但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深入地研究和阐释中国的社会，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社会科学学者，身处跨越式发展的社会，创建适应于研究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达此目的，当前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开展创新性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急待改进的问题。

民族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料的积累阶段，包括民族志和其他研究资料的积累，其成果以调研报告和民族志等描述性作品为主；第二阶段为理论归纳与解释、验证，是方法论和理论的创新阶段。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学学科在机构、人员和研究成果的规模上都有突飞猛进的扩展，但由于学科基础薄弱，加上学术研究不够规范和浮躁风气的影响，在民族学界的研究成果中，经验和资料积累性的作品较多，短期行为较多，理论归纳的作品较少。在资料的调查与搜集上，部分人又存在调查时间较短、实地调查比较粗糙的问题，造成所得资料的不可

¹ Jan Van Bremen & Akitoshi Shimizu.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M]. Curzon Press, 1999: 1-10.

² 费孝通. 江村经济[M]//马林诺夫斯基序. 商务印书馆, 2003年3月版。

³ Xin Liu. Past and Present: Two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61.

靠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的分析上，在部分人中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以比较空洞的理论讨论为主，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甚至缺少实证的意识；二是对于所述问题和事实仅在宏观上泛泛而论，缺少针对性的理论分析与归纳，也缺少与国际学界前沿研究的对话。这导致在较多研究中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在资料积累中以规范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的调查报告较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原创性成果偏少，特别是较少有国际性影响的作品。

2、创建中国学派的时机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后，我们在多数的学科史中都将人类学、民族学称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科学，我们认为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及一个半世纪以来学者们归纳出的各种理论已经建立起了一门科学，他可以描述出各种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的真实特点，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理论对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给予解释。我们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为人们带来一种理性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

可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特别是后现代人类学、反思人类学对人类学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已经逐渐打破了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光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局限性和明显的缺陷。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可信吗？他真的能够还原并揭露事实的真相吗？

上世纪 60-80 年代，后现代思潮曾被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但现在他已经成了全球的一种流行思潮。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现代科学社会的很多批判确实是击中了要害。

他们举出大量事实，对人类学家所撰写的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

例如：

- 1、有些人类学家的政治的或其它角度的观点对其民族志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妨碍；
- 2、民族志中过多的修辞破坏了真实性；民族志往往是学者的一言堂；
- 3、对异民族语言的不够充分理解，限制了民族志的可靠性；
- 4、对事件背景的难以充分了解从而导致对人物和社会事实的曲解；等。

因此，传统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存在着很多非科学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被调查者的真实情况，而是人类学家的主观臆断，主观创造。

过去学者们通过实地调查的实例，论证成功的很多理论，被证明是过度解释，是“削足适履”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思想是在 90 年代以后才对中国人人类学界产生实质的影响。当时正是这一思潮在西方得到急剧传播扩散的时期，并曾一度造成人类学认识论虚无主义的流行，使一部分学者堕入空谈。

所以，当时我国少数学者由于未能全面理解反思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的本意，未能接受其积极的一面，反而受其负面的影响，轻易地放弃了实地调查的实践，也堕入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从事这样的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书匠，在课堂上介绍西方的学科理论，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有创建的学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后现代的批判，我们人类学界应该如何去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呢？

很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最著名者，也是最有成就者当属格尔茨。¹

他再次为过去很多学者曾反复强调的“深描”定义，认为过去所谓“深描”其实都还是“浅描”。如何深描呢？虽然他提出了一些办法，也做了一些探索和示范，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一个真正可行的办法，于是有人批评他的示范也是在“过度诠释”。²

¹ 石奕龙.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J]. 世界民族, 1996(3). 王铭铭. 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J]. 教学与研究, 1999(4).

² 裴玉成.解释的可能：读格尔兹的深描观点[J]. 西北民族研究, 2007(1). 徐榕. 解释人类学述评[J]. 百色学院学报, 2007(4).

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出路在哪里呢？这需要国际人类学界集体的探索。

后现代思潮对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有力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西方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之局限，继续步西方后尘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在国际人类学界普遍开展的反思中，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时机，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了。

【论 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述评*

刘亚妮 杨 恕¹

内容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实施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边疆教育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公民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观念、促进文化交流，提高边疆民族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此，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法令法规、计划措施在边疆教育中实施公民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得各民族了解现代公民知识，增强爱国意识，对开发边疆、巩固国家的统一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成效是非常有限的。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边疆教育 公民教育

推行边疆教育是南京国民政府开发边疆、治理边疆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实施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边疆教育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公民教育。因此，实施公民教育既是边疆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边疆教育目的的关键。然而，目前学界鲜有人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中的公民教育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其成效，从中总结对当代边疆治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和边疆教育

1、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并受到普遍重视的问题，但对其内涵的解释则见仁见智。简而言之，公民教育是把国民教育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责主体的过程，从而使国民明确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进而增强国家凝聚力。因此，公民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稳定统一至关重要。正如

* 本文刊登在《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182-188页。

¹ 作者简介：刘亚妮，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威尔·金里卡所说“在多民族国家中，公民教育一般有双重功能——它在每个组成的民族群体内部培养一种以共同语言和历史为特点的民族认同，并且还谋求培养一种能把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的超民族认同。”^{[1](p348)}国际上公民教育的经验表明，公民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社会文明化的关键。

近代中国公民教育大体经历了清末公民教育的萌芽，民国初期 20 年的快速发展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低迷几个阶段。^[2]事实上，民国时期从社会到政府众多教育界人士、组织投入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形成了从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到各种教育实践的较为完整的公民教育体系。民国时期公民教育实施途径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式；主要内容体现在民族精神教育、学校训育、伦理道德教育以及学生军训和童子军教育等方面。^[3]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即着手进行教育改革。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立即倡导“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的德、智、体、美、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思想并付诸实践，我国公民教育也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20 年代社会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1922 年由各界教育人士倡议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成立公民教育组，讨论公民教育问题。认定国民教育就是“以德谟克拉西的原则，造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人类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4](p62)}1924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集会认定好公民的标准是：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赛；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4](p62)}

在各界教育人士的推动下，1922 年 11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新学制，即壬戌学制，随后进行课程改革运动，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取消修身科，设立公民科，初级中学设立公民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4](p45-46)}小学一至六年级公民科的教学内容主要以社会生活为轴心，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国际生活等方面逐级展开教育。^{[5](p176-177)}小学公民教育最低限度的标准为：初级小学“1、明了个人与家庭、学校、职业的关系和服务的责任；2、明了市、乡、县、省的组织，和公共事业的性质大概；3、有投票、选举、集会和提案等关于地方自治的常识。”高级小学“1、明了国家的组织、经济、地位以及国际的情势；2、明了公民对于国家、国际的重要责任；3、能述做良好公民的条件。”^{[2](p174)}从此，公民科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学校正规公民教育开始得到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经以党义科取代公民科，由于各界的反对形式上很快恢复了公民科。但在内容上除授壬戌学制规定公民科教学内容外，实际上增加了党义内容。1932 年 10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正式改公民科为公民训练科，废止书本讲授。另定团体训练时间，原公民科常识纳入初小常识科和高小社会、自然等科。中学公民科不变，1942 年中学公民科教材增列训育规条，训教合一。^{[3](p185-186)}

1939 年，教育部制定《训育纲要》，全面阐述了训育的意义及道德的概念，具体制定了各级各类教育机关训育的目标和要求。其中小学公民训练标准颇能体现当时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包括四项目标，二十条规律。目标：（1）关于公民身体的训练：养成运动卫生的习惯，快乐进取的精神，使能自卫卫国。（2）关于公民的道德训练：养成礼义廉耻的观念，亲爱精诚的德性，使能自信信道。（3）关于公民的经济训练：养成节约劳动的习惯，生产合作的知能，使能自育育人。（4）关于公民的政治训练：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使能自治治事。规律：中国公民是强健的、快乐的、勤劳的、节俭的、诚实的、敏慎的、负责的、忠勇的、孝敬的、仁爱的、守礼的、好义的、廉洁的、知耻的、生产的、互助的、奉公守法的、爱国爱群的、拥护公理的、信奉三民主义的。^{[6](P334-336)}

尽管公民教育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概念，但其内涵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点。在西方，国家教育的发展被看作巩固公民的权利、自由、责任的必要条件^{[7](p11-12)}，体现出个体本位。由于国家面临摆脱贫穷落后的任务，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着

眼于公民道德和义务的培养，体现出社会本位和责任本位，缺乏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启发和培养。民国初期到壬戌学制颁布之后一段时间的公民教育在内涵和要求上比较接近西方的公民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加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公民教育在内容上更加体现出以国家为核心的特点。强调以国家各项利益为中心，强化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责任意识的培养以及奉献精神 的培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更加要求教育的重心“必须与国家之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种种建设相配合，而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依归”^{[6](p327)}。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更倾向于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强调服从国家意志。

2、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一直是言而不行。直到 1929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蒙藏教育司，专管蒙藏民族及其他相关教育事业，是为中国专设少数民族教育机构之始。随着蒙藏教育司事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蒙藏教育”的概念越来越显得不够准确。政府以及各界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蒙藏教育”的实施对象不仅包括蒙、藏等民族，还包括西北、西南、台湾地区以及散居各地的其他民族。此后，在时人论著以及政府相关文件中陆续出现“蒙藏教育”、“边疆¹教育”交替使用的情况，最终发展为“边疆教育”取代“蒙藏教育”。国民政府行政院 1941 年公布实施的《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规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一律施以边地教育。”^{[8](p2)}这就具体指明了边疆教育的范围“显然以文化的边疆为准绳。”^{[9](p2)}蒙藏教育司也于 1946 年正式改称“边疆教育司”^{[9](p3)}。此后，“边疆教育”成为各界统一的认识。

对于边疆教育的具体内涵，时人也做了阐述。刘曼卿认为，边疆教育的重心是“教”、“养”、“卫”并重，即通过“培养民族思想，增进产业，训练国防自卫能力”，“培养枪支笔杆以及各种劳作兼备的良好公民”，以达到“边疆社会安宁，人民乐业”。^{[10](p2)}曹树勋将边疆教育概括为：“以教育为手段，开化并建设文化的边疆，达到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统一之目的者是。”^{[11](p4)}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边疆教育“以居住于文化边疆之各族为目的”。边疆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一种文化的传授、改进与创造，边疆教育“除保存及传授各族之固有文化或地域文化之外，并须灌输民族国家所需的统一文化与现代文化”^{[9](p8)}。“当特殊性质之语言文化，渐次不成其为特殊时，边疆教育之任务即告終了，改施以一般的教育。”^{[12](p6)}可见，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以“文化的边疆”为施教范围，以居住在“文化的边疆”“诸非汉语人群”为施教对象。其目的在于：“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并根据人民各别之特殊环境，切实谋其知识之增高，生产技术之增进，生活之改善，体育卫生及国防教育之注重。”^{[13](p94)}为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制定政策计划、开展调查研究、推行各级各类边疆教育，并取得一定成效。

开发边疆，巩固国防，须教育先行。但是，边疆地区在地理条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等方面与内地差异较大，若不加区别地实施全国一致的普通教育，不但会徒劳无功，而且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国民政府在三民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之下，本着适应与交融的原则，实施特殊的边疆教育，对于培养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实施边疆教育，对边疆地区进行“文化的开发”也是国家均衡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

总之，边疆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各民族国民素质。这一目的和公民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开发边疆、建设国家、巩固国家的统一稳定和

¹ 民国时期人们对“边疆”一词的涵义见解颇多。吴文藻曾经对当时流行的说法做了综述：“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通常称边疆为‘塞外’、‘域外’、‘关外’，而称内地为‘中原’、‘腹地’、‘关内’，二者相对者言，这些称谓，亦代表了政治及地理的观点。然而国人另有一种看法：东南诸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并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称为边疆。这明明不是指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

抵御外来侵略，在边疆地区实施公民教育显得尤为迫切。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的实施

（一）边疆教育宗旨及原则

教育乃立国之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需要符合时代要求、适应特殊国情的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以确定实施何种教育、达到什么目的、朝什么方向发展的的问题。

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曾经指出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的教育宗旨，民国以来“袭取外国教育学说，才以德育、智育、体育为教育宗旨，然而太空泛了”^{[14](p65)}。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定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并规定各级学校应遵守如下方针：“一、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通，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义务，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合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二、普通教育，需根据孙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6](p289)}

据此，经长期研究，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五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了各级各类教育目标及实施纲要。第六章为蒙藏教育，其目标如下：“一、依遵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力谋蒙藏教育之普及与发展。二、根据蒙古、西藏人民之特殊环境，以谋蒙藏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自治能力之训练，及生产技术之增进。三、依遵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则，由教育力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并规定各级学校的课程应根据内地标准并斟酌蒙藏实际情形编订，小学教科书用蒙汉文、藏汉文合编，中等以上学校教科书用汉文编订为原则。各级学校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一）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二）边疆和内地之地理关系；（三）帝国主义侵略蒙藏之历史及事实；（四）蒙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五）蒙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六）蒙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七）其他有关蒙藏人民特殊环境之教材。”

同时规定训育原则为：“一、各级学校之训育，应根据蒙藏民众之生活情况参照内地各级学校之训育标准实施之。二、各级学校训育之实施，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一）以科学的常识，破除其对于自然界的迷信；（二）唤起民族精神，以破除其部落思想；（三）由国际时事之讲解和团体生活之训练，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15](p1044-1045)}此后，随着边疆教育的广泛深入的发展，相关政策、计划、措施有所调整，但始终以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第六章的基本精神为标准。

以上教育宗旨、实施方针以及三民主义教育原则体现出民国教育以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合格公民、求得民族独立和生存、国家发展乃至世界和谐为主旨。同时明显体现出为挽救民族危机、以期教育救国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教育的目的：培养有效的、甘愿的与忠诚的公民。^{[7](p11)}

（二）边疆公民教育的实施

学校的一个主要职责是教育好公民，学校教育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和正规的政治文化的培养过程。^{[16](p466)}学校把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引导学生的政治兴趣，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训练学生初步的政治能力等。国民政府深知学校教育在国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对边疆学校教育除了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公民科、公民训练科之外，更有特殊要求，体现出通过教学实

的边疆。”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一卷第5、6期合刊。

践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地灌输、渗透公民知识，力图把政府所认同的政治取向模式和行为规范传授给边疆各族学生。

1、边疆各级学校普遍实行训育制度

实施训育¹是国民政府时期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的训育制度“源于我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及教育思想，特重五伦，以训教合一之方式，力求学生实践”^{[3](p18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级学校在行政组织上设置教务、总务及训导等机构，并由训育主任或训导主任负责训导工作。此外当时初级中学的童子军教员、高级中学的军事教官有协助推进训导的责任。1938年教育部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规定中学训育制度实行导师制，每级设导师一人，由校长聘请专任教师担任。^{[3](p183)}

1939年教育部成立训育委员会，负责策划改进各级学校的训导工作。同年制定了《训育纲要》，首先指出训育的意义在于陶冶学生“健全之品格，使之合乎集体生存（民生）之条件”，通过“好学、力行、知耻”培养学生实践道德之能力，使德智体三育相互为用。^{[6](p323-324)}并规定了训育目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机关的训育工作要点，其中关于边疆教育的训育要求如下：“边疆学校及边疆教育机关训育之实施，除参照内地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训育标准外，并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1) 以内地固有之语文文化渐次陶冶边疆青年及儿童，力求语文与意志之统一。2) 阐发国族精神，泯除其地域观念与狭义的民族观念所生之隔阂。3) 注意讲解民族融合史及边疆与内地地理经济之密切关系，以阐明国内整个民族意志与力量集中之必要。4) 维持其宗教信仰，并随时利用科学常识，以破除其有碍于智育体育进展之迷信习惯。5) 由国际时事之讲解，与团体生活之训练，以养成其爱国家民族之精神。6) 引证内地及边疆之礼俗，说明其利弊，使其知对于社会国家及国际间应有之态度。”^{[6](p340-341)}

实际上这些规定成为此后边疆公民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标准。1945年国民政府又公布《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训育委员会负责制定训育计划，三民主义教育、军事教育、童子军教育的督导及考核，训育人员的培养学生自治团体的指导和训育学术的研究等工作。^{[3](p182)}此后，训育委员会颁布了一些法令法规，全面加强各级学校训育工作。

2、课程设置方面特别注重国语、历史、地理等课目的教学

边疆学校一律推行国语教育，同时注重历史、地理等课目的教学。国语、历史、地理等科目不仅传授知识，其内容更加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观念。1935年，教育部、蒙藏委员会会订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规定先编辑民族适用之小学教科书国语、公民、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自然等科）三种，均以国语为主，旁注蒙回藏苗等文字。其内容要点为：“注意民族生活之状况，灌输科学智识，并间以政治材料，捍卫国家之历史人物，以启迪知识，养成国家观念为鹄的。”^{[15](p868)}1941年，教育部订定的《边远区域初等教育实施纲要》就小学公民训练和公民知识、国语、常识（或自然社会）等科目的内容作了民族团结、爱国家爱民族的特殊规定。^{[17](p100)}国立边疆职业学校课程除照内地职业学校课程规定外，“边生酌加国语文及公民常识之训练，汉生则酌加边疆语文及边地知识之训练”^{[3](p285)}。

合格充足的师资，是发展边疆教育的关键。教育部1941年颁布了《边疆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以后又作了修改补充。培养目标首先即为“了解国族意义”，科目及课程标准方面暂依普通师范学校规定外，各科又作了特别说明。如公民科“须依中华民族为整个国家的理论，讲解民族主义以阐发爱国精神，消除地域观念与狭隘民族观念。随时引证内地及边地的政治礼俗，说明其利弊，培养学生对于社会、国家及国际的正确态度。”国文科“使学生通晓国语及注音符号。所选文章，应注意民族团结及现代伟人传记，表扬中国之文化，并注重应用文，同时将边地固有

¹ 训育是对学生行为品德的训练和管理教育的活动或体制。清朝末年兴办学堂初期，将这方面的工作统称为管理，并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五四运动后，改称为训育。参见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本（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4页有关训育的解释。

的文艺故事进行整理改编后列入课文。”地理科“应注重边疆与内地经济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尽量采用建国方略中的材料，说明最近我国建设之进步，对于边地形势，乡土地理，尤须特别注意，教师须随时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历史科“注意讲解民族融洽史实（其有伤民族情感部分一律删除），国民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及抗日战争之形势，以阐明国内整个民族意志与力量集中之必要。”^{[17](p107-108)}

3、教材编订与征集内容要求结合边疆地区的实际

边疆学校教材编订一般要求符合边地情形。教育部于1932年着手蒙藏回文国语教科书及小学课本、民众读物的编译。1940年教育部订定《边地各级学校补充读物及参考图书编辑办法》，编译刊行孙中山遗训、三民主义浅说、抗战建国纲领浅释（维文译本）、蒋委员长训词（蒙藏维文译本）、中央有关边疆问题重要文告专册，以及民族人物传略，如成吉思汗与蒙古西征（维文本）、张骞、班超等，达百余种；蒙藏维文三种《中央编报》，每月发行，每期国文固定一版，民文三版，作为边疆各民族主要读物。1946年，扩充篇幅，改为16开型。以报道时事、宣传政令为主，兼刊史地、科学知识。^[18]1945年教育部公布《边疆初等教育设施办法》规定边疆小学各科教材内容“力谋切合边地情形，并根据中华民族为一整个民族之理论，激发爱国精神，泯除地域观念与狭义的宗族观念所生之隔阂”^{[17](p116)}。1946年聘请专家就国定本小学教科书分区组编地方性、民族性教材，译成蒙藏维文。

各地根据要求编印了很多内容丰富、符合边地实际的教材。例如西康省曾经编印了一套适用于康区的教科书，体现出以下特点：注意结合康区藏民生活；寓有爱国家爱民族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注意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改进藏民生产；注意向学生灌输医疗卫生常识。其中有以下内容：“我们吃的粮食，有青稞、有麦子、有豌豆、还有白米。”“先生是汉人，我是西康人，汉人是中国人，西康人还是中国人。”“我们的民族有汉、藏、回、满、蒙五族，都是一家人。”“田里种稻，地上种麦、种稻种麦、都是要是肥料，要除草，要灭虫，收获才好。”“害了病，请医生，诊断吃药，得安宁，也免传染伤生命。”^{[19](p240-241)}

教育部为改进边疆教育，适应地方需要，还要求各学校自编乡土教材，于1941年公布了《征求边疆教育乡土教材参考资料办法》和《征集边地教育史料办法》。征集内容有乡土历史、乡土地理、当地特有之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文艺、乡土社会、乡土娱乐等。据此出现了一大批应征的乡土教材。^{[19](p242-243)}

4、教学形式多样化

除了具体教授公民知识之外，边疆学校还采取其他辅助教学形式，力图实现全方位的学校公民教育。如规定每周参加总理纪念周，音乐课教唱爱国歌曲，如《总理纪念歌》、《抗日救国歌》等^{[22]94}。洮州（今临潭）私立第二完全小学的校歌体现出民族团结：“洮水涌，朝日临，回民儿童大本营。读的中国书，说的中国话，我们不分任何界限。我们不讲狭义的民族。过去的畛域要它完全化除。读书是天职，扫除文盲，开发边区。”^[21]此外，教学设备特别应包括内地文物挂图以及党国旗、国父遗像、国民政府主席肖像等。^{[17](p116)}还有其他有助于公民意识培养的相关规定，历年关于推行边疆教育边疆的计划都规定，各学校以所在地为校名，不得冠以民族、宗教之名词。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的成效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教育已初具规模，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数量上体现出公民教育的成效。据统计，1946年各边疆省份边疆教育事业中中学20所，师范25所，职业学校17所，小学4,843所¹；1947年国立各级边疆学校43所，学生数9611人。

¹ 参见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甘肃省图书馆藏本，1947年版，第130页，“三十五年度各边

¹除此之外公民教育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感逐渐增强，形成较强的凝聚力。

1、增强了边疆各民族的爱国意识，同仇敌忾，以各种形式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首先通过各种集会、通电的形式表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例如，1938年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致全国同胞电称：“我边疆人民无宗教族系之别，咸凛然于国家人民之绝对同其命运，及国内诸民族之绝对不可分，以唯有一致团结牺牲奋斗，方可以达卫国保民之目的……代表等来自边疆，洞悉民意，信仰三民主义，服务救国工作，深信以大中华民族共同一致之奋斗，必能获最后之胜利。”^[22]

其次，捐献财物支持抗战。正如时人所说：自从政府本着“以达大中华民族之团结的目的”推行边疆教育以来，“边疆各族，已有广设学校之普遍要求；并在抗战期间，自动捐献食粮、马匹、毛革，及广大之人力，或供军用，或助运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迄抗战终止而不替。此为中国边疆教育已收之效果，预计此种效果，将与边疆教育推进之时间成正比”。^{[13](p99)}拉卜楞藏族僧众在第五世嘉木样活佛等爱国人士号召下，抗战期间通过献金、献粮、捐献战马等方式源源不断地支援前方，并于1938、1944年两次组织代表团赴重庆和各战区慰问。特别是1944年，代表团将从各寺院、各部落筹集到可购买30架飞机的巨款90万元银币献给了国民政府，并献上土特产品和锦旗。^[23]拉卜楞僧众的这一献机义举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最后，各族人民亲赴战场，保家卫国。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令马步芳抽调部队，组成“骑兵暂编第一师”，由师长马彪率领东进抗日。这支队伍共8,000多人，其中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官兵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为汉、藏等民族^{[24](p125)}，在抗日战争中有积极表现。1944年12月，为响应蒋介石“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夏河县60名藏族热血青年赴省入伍，参加抗战。^[23]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北后便侵入我国滇西德宏、腾冲等地。这些地区的傣、景颇、德昂、傈僳、阿昌、佤、拉祜、白、汉等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25](p275)}

2、边疆各民族原有观念逐渐转变

边疆地区各民族深受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的影响，排斥现代教育，“视学校为畏途”者有之，视上学为“当学差”者有之，雇人上学者亦有之。自从政府推行边疆教育以来这种局面有所改变。1928年，新疆省教育厅长刘文龙报告新疆教育状况时指出：新疆缠民（维吾尔族）因为语言不通以及宗教关系，“有产阶级之子弟都不愿送入汉校读书，谓念缠经可以充当阿訇、毛拉，可以经商，登记账簿，汉校所得毫无所用。官中强令送读缠族，迫于无可奈何，用钱雇送贫民子弟。此等贫民子弟视入学校为当差，勤于求学者盖甚寥寥。”^{[15](p861)}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到1946年，骆美免关于新疆教育的报告显示：新疆不仅形成了从初等、中等、师范、职业到高等教育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而且社会教育也同时推进，设置在从城市、农村到游牧区域的民众学校达到1,006所，学生达154,396名。新疆各民族“一变过去畏避入学之心理，相率入学”^{[26](p493)}。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变化，如《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关于民国三十三年度边地文化工作报告》中指出：自从边疆教育推行以来，“边民青年男女向化日深，尤慕中原文化，不时请求进省参观”，服务部组成川西佳山寨羌民学生参观团十五人去成都，参观文化团体、卫生机关、现代工厂以及名胜古迹，受到包括军政首长、文化团体、国际团体在内的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和招待。这是羌族历史上第一次进省参观，受到各界平等待遇，羌民学生深受激励，再不愿被称为“边民”。羌民学生从内心切实感知到他们与内地人民的平等和一致。同时，边疆民族已经知道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关心学校，除了纳学粮之外，主动改建、修建校舍，有人捐献谷物发展教育。^{[17](p209-213)}通过接受现代教育，各民族成员逐渐认识到，他们和内地人民作为中国人是相同的，在人格上是

省边教设施概况表”。

¹ 参见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甘肃省图书馆藏本，1947年版，第118—120、122—123页，“国立各级边疆学校简表”、“国立各级边疆学校概况表”。

平等的。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从整体上来看具有起点低、战时意识强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时代特点和局限，因此，公民社会远未建成，甚至可以说才开始起步。对于具有几千年深厚思想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公民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所以边疆地区公民教育的成效更是相当有限的，其原因首先在于当时整个边疆教育面临诸如经费不足、师资缺乏、教学条件简陋、宗教因素的影响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和困难势必会妨碍公民教育的推进。^[27]其次主要在于主观方面的因素。公民教育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公民权利是公民教育的逻辑起点，责任本位是公民教育的导向。近代中国引入西方公民教育的外壳，植入改造国民性、重建国民道德、塑造新民的内容。强调通过教育使公民明确个体对国家、对社会、乃至对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忽视了公民应该享有的各项权利。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统治，更是提倡用“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原则教育、要求国民。蒋介石 1932 年在长沙各界代表会上甚至说：“礼义廉耻是复兴我们民族、挽救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工具。”^{[14] (p145)}以这种陈腐的价值观引导公民教育，只能把国民训练成“顺民”，而非“公民”。如此公民教育也就走上了歧路。

国民党为加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曾经以党义科取代公民科，后来由于各界的反对，形式上虽然取消了党义科，但实质上将党义内容渗透到其他各科教学中，实行“党化教育”。1930 年 11 月 18 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普及教育奖励学术案建议“课目寓党义及公民常识于国文中”^{[15](p1029)}。1931 年，甚至有人建议不仅将党义内容编入国语教材，而且渗透于商业、农业、地理等教材。^{[15](p1083)}1936 年规定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的一项工作就是“使党义教育能渗透于学生全部生活”^{[15](p1105)}。这些认识和主张使得公民教育体现出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党化教育不仅冲淡了公民教育，而且使得公民教育的内容趋于狭隘。这自然影响公民教育效果，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阻碍学生正确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甚至会导致学生的反感。因为，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并非是被动的，“个体在接受社会训练和教育的同时，通过对环境的认识、对政治关系的把握和对政治观点的分析，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认知以及‘政治自我’和‘政治人格’，并以此修正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和改造社会既有的政治文化。”^{[16](p463)}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的经验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教育具有历史局限性，其成效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在推进边疆公民教育的过程中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对当今的边疆治理不无裨益。

1、发挥政府在边疆公民教育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

教育是公共事务，国家的儿童“应该由国家进行教育”^{[7](p11)}。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推进边疆教育，制定、颁布了多种法令法规、制度章程，为边疆公民教育制定目标、原则、方针和具体办法，为实现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从而发挥了政府应有的主动性和主导性。教育部西南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以爱尔兰独立的基础为始终控制初等教育为例说明边疆学校应以公立为原则的重要性。^{[17](p156)}同年，教育部订定《边远区域初等教育实施纲要》规定：边疆小学不收学费，由学校供给必需的学习用具，并酌设奖学金名额。^{[17](p101)}1945 年 9 月，公布《边疆初等教育设施办法》，要求边疆小学以公立为原则。^{[17](p115)}

2、特别注重通过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菲利克斯·格罗斯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人们普遍怀有的不需要与任何人敌对的情感”，“是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赞赏”，“是对民族的一般文化的眷恋”。“最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是自发地表现出来的，自愿地承担对其他人、对作为个人认同基

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28](p48)}。因此，爱国主义是建设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

作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历史上多次出现民族矛盾和冲突；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又多次侵略我国边疆地区，造成边疆危机。出现这种局面原因除了历代统治者的错误政策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边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感不强，现代国家观念薄弱，民族隔阂严重，如同一盘散沙，给列强造成可乘之机。“社会的统一不仅要求有共同的原则，还要求有共同的归属感。公民必须有归属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且有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总之，社会统一要求一些公民和其他一些公民保持一致，并把他们看作‘我们中的一员’。”^{[1](p345)}因此培养各民族对国家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和团结，这一点在近代中国显得尤为迫切。国民政府从推行边疆教育之始就本着孙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的原则，特别强调培养边疆民族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力谋边疆各民族抵御各帝国主义侵略意识之增高”^{[15](p830)}。

在具体实施公民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灌输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观念，如规定各级边疆学校混合编班，以增进各民族相互交流，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感。同时通过向国旗宣誓效忠、悬挂权威人物照片、唱国歌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政治知识，增强政治责任，培养爱国意识。这种爱国主义意识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成为公民的心理气质，并改变其行为，尤其在国家和社会面临一些重大考验或困难之际会被激发和唤醒，起到增强国家凝聚力的作用。国民政府对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有成效的。抗日战争时期，边疆各族人民抛却狭隘的民族观念，同仇敌忾，表明抗日立场、投身抗日战斗、捐献财物等行为即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这种对国家的情感和责任意识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条件之一。

3、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行推进边疆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教育对象在正确处理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时应具有的一种公民意识，主要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批判意识以及爱国意识。”^{[2](p136)}这种意识不仅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同时也可以通过广泛的社会教育培养，从而为公民教育的实现提供全面而广泛的途径。国民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推进边疆地区的公民教育。在边疆学校教育中系统地、正规地教育各族学生，训练其应有的公民能力。社会教育¹面向的是人数众多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水平落后、文盲率极高的近代中国来说，形式灵活多样而又免收学费的社会教育，更能发挥公民教育的功能。边疆社会教育通过识字教育、巡回教育、各地建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科学馆等多种方式，力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渗透公民教育于各民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造就合格公民。抗战期间还规定学校兼办社会教育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而为一，起到整合公民教育社会资源的作用。

4、渗透公民知识于多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

共同的民族认同依赖于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边疆学校教育中，除了设立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公民科”外，还通过国语、历史、地理等相关科目内容中编辑相关公民常识，进行多环节公民教育，并规定“公民、国文、史地等科教材，应力谋连贯。”^{[15](p1107)}威尔·金里卡认为：“对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的需要表明，国家应该反复灌输一种共同的语言。实际上对官方语言的界定、标准化和教学，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民族国家构建’的首批任务之一。”^{[1](p346)}通过统一的语言文字教育，在相关科目中有意识地体现各民族融合史、国家固有版图、边疆与内地的关系、

¹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民众爱国意识、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培养社会公德、陶冶民众情感、强健国民体魄、养成公民资格。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9—1043页《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有关社会教育的规定。

² 1938年制定了《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规定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通过举办讲座、识字教育、防空防毒知识宣传、救护训练、壁报、通俗讲演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敌宣传和教育。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页。

帝国主义侵略史等各民族共同的经历，培养超越狭隘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同时，在其他诸如图画、音乐等教学活动中进行辅助教育。

5、不干涉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在推行边疆公民教育的过程中遵循不干涉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原则。西北、西南地区同内地在地理、文化、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不相同，很多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在这些地区进行现代国家公民教育，首先涉及到观念的转变。然而，社会意识的转变往往滞后于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依靠国家权力强行扭转。因此，国民政府在不干涉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常识的灌输对各民族施加影响。使各民族成员自然地增加知识、破除迷信、改良风俗，逐渐地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转变。而“对于地方现有制度，宜作比较讨论，以供改进，不得妄加攻讦”^{[17](p109)}。同时改进寺庙教育¹，通过寺庙附设教育机构、利用宗教集会的机会，适时地发挥寺庙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逐渐改变僧众的观念，从而打破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法规、计划措施在边疆教育中实施公民教育，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使得各民族学生、民众、僧人了解现代公民知识，增强国家观念，形成爱国意识，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对开发边疆、巩固国家的统一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边疆公民教育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其中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又有应该汲取的教训。

注释：

- [1] (加拿大) 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M]，邓红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2] 檀传宝：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3]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教育志（初稿）[M]，台北：国史馆出版发行，中华民国 85（1996）.
- [4] 冯开文：中国民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 [6] 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 [7] (以色列) 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8] 行政院新闻局：边疆教育[M]，甘肃省图书馆藏本，1947.
- [9] 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M]，甘肃省图书馆藏本，1947.
- [10] 刘曼卿：边疆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1] 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M]，上海：正中书局，1945.
- [12]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M]，甘肃省图书馆藏本，1943.
- [13] 杜元载：抗战时期教育[M]，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C]，台北：民国 61(1972).
-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Z]，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4.
-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Z]，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4.
- [16] 陈振民：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Z]，南京：

¹ 1940年7月，教育部公布《改进寺庙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地喇嘛庙或清真寺视经济能力，办理以下事项：“1）附设民众教育馆或阅书报室；2）附设小学民众学校或各种补习学校；3）举行通俗讲演，并在讲经后作精神讲话或识字运动；4）举办壁报；5）装备无线电收音机；6）其他切合社会需要之教育。”寺庙举行盛大典礼时，当地主管教育机关应适时地举行联欢会或座谈会、通俗讲演、放映教育电影或幻灯、举办内地文物展览会、印增总理遗像、总裁照片、画报及各种宣传品以及其他切合社会时宜之教育。礼拜寺附设阿文学校每天必须增加国语、常识各一个小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6页。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18]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J],民族教育研究,2000(4).
- [19]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 [20]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一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21]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代旅行日记[J],新西北,1942(第2卷第3、4期合刊).
- [22]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致全国同胞电[J],西北论衡,1938(第6卷第2期).
- [23]林跃勇: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西藏研究,1999(2).
- [24]韩效文、杨建新: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北卷下)[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 [25]韩效文、杨建新: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南卷下)[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27]关于边疆教育存在的问题参见刘亚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探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 [28](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论 文】

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遗产¹

——以乌斯满的行为逻辑和社会互动为例

菅志翔¹

论文摘要: 由于行动者具有自身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征,会从社会结构中自身位置的特定角度出发思考和行动,所以,当多个行动者面对同样命题时,行动的具体事件过程及其结果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中,文化表现为结构规范、行动者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标准等具体可观察的社会事实,文化的变迁与传承也由此而成为可以经验地加以研究的对象。本文试图以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在新疆哈萨克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乌斯满——的行为逻辑和社会互动为例,来分析人们处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具体实践及其社会后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当社会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遗产三者纠结在一起时,它们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和今天的学者而言,能够分别构成什么样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 社会结构 文化遗产 社会行动者 乌斯满巴特尔

¹ 本文为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民国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国家政权建构和民族政策演变过程研究”(项目号:2009JJD840002)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的议题一般都建立在探究有关社会事实的这样一组问题的基础之上。这组问题所包括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处在什么情境中、因为什么原因、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结果。这组问题涉及到具体的行动者、社会宏观结构和互动条件、行动者的主观意图、行动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行动导致的社会反应等。由于每一个行动者本身都具有自身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征，会从社会结构中自身位置的特定角度出发思考和行动，所以，当多个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特征的行动者面对同样的命题时，行动的具体事件过程及其结果就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中，文化则表现为结构规范、行动者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标准等具体可观察的社会事实。文化的变迁与传承也由于这些社会事实的可观察性而成为可以经验地加以研究的对象。由于不同结构位置上的行动者所关涉的社会事实不同，因此，通过这些社会事实而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实践逻辑也千差万别，这就使得文化传承在经验世界里表现为极具多样化的能动者的判断、选择和再建构。

本文试图以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在新疆哈萨克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乌斯满——行为逻辑和社会互动为例，来分析人们处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具体实践及其社会后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当社会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传承三者纠结在一起时，它们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和今天的学者而言，能够分别构成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是人在保护文化，还是文化在护育人，抑或文化仅仅是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为人所用的实践工具？我们在讨论文化议题时能否省略文化的实践者及其社会性和多样性？脱离了承载文化并生活在文化中的社会行动者的现实需要和自主抉择，文化的局外人所谈论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由于有关乌斯满的研究文献不多，本文主要以笔者 2010 年夏季在新疆开展的口述史调查资料为主。这次口述史调查访问了近 20 人，其中包括乌斯满的家人以及亲历那段历史的老人。在对这些材料进行梳理和本文的写作时也参考了美国学者琳达·本森（Linda Benson）所做的乌斯满研究（1988）。本文参考的其他有关 1940 年代新疆哈萨克的文献，主要有张大军先生的《新疆风暴七十年》（198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995）、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的《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92）、王柯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2013）、吴启纳的《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2006）等。

一、乌斯满生平

乌斯满生于 1899 年²，中国哈萨克克烈部毛尔合（亦称莫勒合）部落人，是 1940 年代哈萨克社会最有影响的巴特尔（“英雄”之意），也是新疆解放时期著名的反革命匪首。根据笔者在当地部落开展的口述史调查，乌斯满的父亲是一位毛拉，他本人曾受过一定程度的宗教教育。他青年时代家境贫穷，以放牧、经商为生。乌斯满个性勇敢刚毅，不畏强暴，18 岁时曾与当时著名的祖哈巴特尔的下属交过手，祖哈认为他注定会成为一名巴特尔。在青少年时期，乌斯满曾经跟随过哈萨克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图书的学者阿合提哈志，这位学者在近代哈萨克文化史上的地位堪比阿拜。在“乌斯满的人”³眼里，他是一个信仰虔诚、热爱家乡、保护人民、忠诚守信的巴特尔。

因为反对盛世才搜缴枪支以及盛对哈萨克部落头人和宗教领袖的迫害，乌斯满于 1940 年初开始参加武装反抗盛世才的起义，并在 1941 年组织了自己领导的游击队。由于他绝不轻信盛世

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² 据笔者访谈的乌斯满子孙及友人讲乌斯满出生在 1899 年，《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亦记为 1899 年。《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记为 1895 年，似有误。

³ 这是受访者们使用的分类。他们把 1940 年代阿勒泰的哈萨克人分为“达列力汗的人”和“乌斯满的人”。

才的说辞，坚持以武力反对盛世才的欺骗和迫害，投到他旗下的人越来越多，乌斯满逐渐成为克烈部落中最有影响力的巴特尔¹。

受到从苏联逃亡到中国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人的影响，乌斯满认为苏联发动的社会改革是要消灭私产、消灭宗教。因此，从哈萨克部落传统的生计方式和信仰出发，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公有化，也反对苏联的消灭宗教的政策²。在乌斯满“起义”初期，因为盛世才迫害部落头人和宗教领袖，执行苏联式政策，所以他坚决反对盛世才，成为北疆的一支独立武装。在盛世才脱离苏联控制，返身投靠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之际，苏联开始乘新疆地方政治真空之机借助外蒙古的渠道支持反对盛世才的汉人地方当局的乌斯满³。

“三区革命”⁴开始后，苏联派曾在苏联受训的哈萨克人达列力汗与乌斯满合作，共同击败了新疆省政府在阿勒泰的守军，成立了由伊宁领导的阿山地区政府，乌斯满被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但当乌斯满发现达列力汗和伊宁当局具有深厚的苏联背景，而盛世才已经调离新疆时，他转而投靠国民党领导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向达列力汗和“三区”军队开战，并在中蒙边界冲突的北塔山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⁵。这样，在“达列力汗的人”眼中，乌斯满是一个鲁莽无知、刚愎自用、多疑凶残、投靠反动派的土匪。

由于乌斯满的这种复杂、反复的政治立场，在1949年秋新疆省驻军和新疆省联合政府通电起义以及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乌斯满脱离了新疆省政府，与进疆解放军虽有数次接触，但均未达成“协议”，沦为一名反抗解放进程的反动分子，后被解放军追击到青海，在芒崖被捕获，于1951年5月以“杀害哈萨克群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土匪”的罪名在乌鲁木齐被枪决（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编写组，1985：37-39）。

用本森的观点来说，在反共和维护宗教这样的立场上，乌斯满用尽了新疆当地社会中所有可能利用的政治策略和地方资源。由于有关乌斯满的逃亡和死刑判决过程，有许多事实至今尚未厘

¹ 据受访者介绍，在阿山哈萨克人反对盛世才统治的起义早期，乌斯满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生性多疑，绝不轻信，故在起义领导人两次与盛世才达成协议时，他都躲到山里，观察盛世才对协议的执行情况。1941年底，在两次起义都失败的情况下，乌斯满举起了反抗盛世才统治的大旗，开始组织自己的队伍。

² 受访者介绍。同时参见王珂（2013）第296-297页。乌斯满的反苏立场是一以贯之的，这在他处理与苏联有关的各项事务的态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³ 关于接受援助一事，笔者访谈的“乌斯满的人”都强调：第一，乌斯满一直在用黄金等价交换武器，而不是无偿获得武器，所以，他可以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第二，乌斯满一直避免与苏联方面有染，而是与蒙古方面合作，他一直不清楚支持他的外蒙古政府是受苏联的指派，也不知道外蒙派给他的“顾问”有苏联背景。在占领阿山之后，东突政府要没收武器，由于有盛世才缴枪的前车之鉴，乌斯满对东突政府缴枪一事尤为敏感。乌斯满方面即以武器是他们自己从蒙古人那里买的，不是苏联人的无偿援助为由而拒绝。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乌斯满的人”与“达列力汗的人”是对立的，前者要保护哈萨克社会免受苏联推动的社会变革的影响，后者则是苏联在哈萨克社会推动革命运动的生力军。

⁴ 当时新疆分为十个区，即迪化、和田、莎车、喀什、阿克苏、喀拉沙尔（今焉耆）、哈密、阿勒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伊犁。1944年11月12日，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1945年，张治中以“中国政府不与非法的所谓‘国家’谈判”为由坚决主张将其称为“三区”，而与其它七区相区别。联合政府谈判期间也是三区与七区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因为苏联改变了支持东突脱离中国的路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46年6月解散。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苏联方面命令在三区已经掌握领导权的共产党组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8月18日写给当时的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的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2010：1），建国后遂将发生在三区的政治运动笼统地称为“三区革命”。

⁵ 请参阅王珂通过文献资料对这一过程的再现，见王珂（2013）第211-220页、第296-298页。口述史访谈中获得的资料包含了有关个体之间互动的具体、丰富的内容，这正是文献资料所缺乏的。如果把不同立场的人们的口述史和文献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还是可以发现两种资料的真实性大致相当，且观点差异很大，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复述历史，貌似相互竞争、彼此矛盾，但都符合各种历史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下文对行动者之间互动的分析将进一步呈现这种逻辑。本文也试图在明确历史资料的制造者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和立场来呈现不同立场的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呈现恰恰可以相互佐证、相互补充，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的真相。

清，相关的档案文献也一直没有开放，各种未经证实和相互矛盾的信息使得整个事件看上去扑朔迷离，这一人物的命运充分折射出了国共交替期间新疆地方政治的复杂性。

用今天多数普通哈萨克人的观点来看，乌斯满是一个为了保卫信仰和部落传统而战的草根英雄。在那个年代，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境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践行传统部落文化的哈萨克牧人。从与笔者将要在下文介绍的其他哈萨克精英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乌斯满是唯一用行动保护文化的来自草根社会的哈萨克领袖。

二、乌斯满的结构位置和行为

分析历史人物需要恰当的方法。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将历史人物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将他/她（们）放进他/她（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因为，“无论他会是其他什么东西，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与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米尔斯，1959:170）。如果人为地将历史中的行动者错置于研究者自身想象的、但这些历史人物并没有生存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时空，那样研究出来的历史就只能是哈哈镜中的怪相。如果脱离行动者所处的具体社会时空来解读他们的行动，简单地套用今人的概念与逻辑，那无疑会给他们穿上今人有意无意间制造的“历史紧身衣”¹，从而不可避免地以今人的是非标准对历史人物做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努力所要超越的。正因为如此，本文在讨论乌斯满的行为之前，首先要简略分析 1940 年代乌斯满生活于其中的中国哈萨克克烈部落社会和当时的历史情境。

（一）克烈的部落结构

在沙俄帝国和清帝国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哈萨克各部落的独立性和游牧空间一再被压缩。18 世纪 70 年代，12 个阿巴克克烈部落迁移到阿勒泰地区，1790 年，阿巴克克烈贵族库库岱前往北京朝觐乾隆皇帝，被封为扎萨克王公，受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贾合甫，2001:35-38）。到 19 世纪后半叶，阿巴克克烈的 12 个部落都游牧在阿勒泰地区。

哈萨克社会由按照血缘世系结成的层层叠加的部落体系结构而成，处在最基层的是扩大了父系血缘家庭“阿吾勒”；同一祖先的几代“阿吾勒”组成“阿塔”；13-15 个同一世系的“阿塔”组成“乌露”；“乌露”之上是“阿洛斯”（贾合甫，2001:198-9）。据笔者的口述史调查，这四个层级的部落组织是哈萨克社会生活中直接与人们的日常活动相关联的，每个人在从阿吾勒到阿洛斯的体系中都有自己确定的位置，并且通过部落谱系的记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属以及同其他社会单位和个体的关系。

在“阿洛斯”之上还有三个更高层级的现实或想象的政治结构。由几个“阿洛斯”组成“兀鲁斯”，由可汗的子孙或宗亲统治，首领被称为“苏丹”；“兀鲁斯”之上是“玉兹”，首领被称为“小汗”；由三个“玉兹”构成整个哈萨克部落，首领是可汗（贾合甫，2004:201-2）。此外，哈萨克人的观念中还有一个概念叫“阿拉什”，这个词也是所有哈萨克部落都认同的共同始祖的名字，现在在“哈萨克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之意，类似于古汉语中“天下”的概念²。

阿巴克克烈可能是相当于“兀鲁斯”层级的部落联盟，这个联盟自库库岱受封时（1790 年）算起到 1940 年代已经稳定了一个半世纪。在笔者的调查中观察到，克烈部下属的 12 个部落是“阿洛斯”层级的，也是现实中的婚姻交换单位，至少在 20 世纪上半叶，克烈 12 个部落之间彼此通婚而部落内部不通婚。今天，在我们调查中遇到的克烈部落成员在见面时都要先询问彼此的部落系属，并能很快从各自的父系和母系关系中确定彼此的拟亲属称谓。由此可见，各“阿洛斯”之

¹ 米尔斯在他的社会科学批判中指出这种历史研究制造的“紧身衣”（1959:21）。孙隆基对此举出的例子是“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2004:21）。

² 根据受访者的解释。

间是姻亲关系，而每一个“阿洛斯”下属的“乌露”、“阿塔”和“阿吾勒”之间则是血亲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兀鲁斯”理解为一个由婚姻关系结成的部落联盟。在克烈社会内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纽带是血亲和姻亲，人们通过这两个重要的社会纽带联结在一起，并形成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

按照中亚伊斯兰化的游牧社会的传统，阿巴克克烈部落须由出自托烈部——成吉思汗的后裔——的贵族来统领。自1790年受封之后，库库岱扎萨克亲王一直统治着阿勒泰的克烈部。但兀鲁斯“苏丹”，即库库岱亲王并不直接干预各个“阿洛斯”内部事务，“阿洛斯”仍由各自的首领统领，在清代多受封台吉、扎楞等职位。“兀鲁斯”阿巴克克烈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所有的12个“阿洛斯”共同推举4个熟知法典和习惯法、为人公正无私、能言善辩的“比”，他们在整个克烈社会中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传统上四个“比”一般出自势力最大的两个“阿洛斯”中（实际上也是兀鲁斯共同祖先的长子长孙所在的部落，出自这些部落的“比”的辈分因而较高，具有来自年龄的位势优势），而具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部落也属意角逐“比”，这为阿巴克克烈的分裂埋下了伏笔¹。

除这种世俗部落结构之外，伊斯兰教在哈萨克社会中的影响在近代以来也日趋深远，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对宗教引导的需要日甚一日，学识卓越的毛拉享有崇高威望。由于一般情况下各部落的毛拉均出自“和卓”的后代，大毛拉同时也具有贵族身份。

在哈萨克社会中，这种由托烈、和卓的后代即所谓的贵族和各部落世系头人组成的社会上层，负有做出和执行重大决策、保卫部落领地、保护部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贫困牧民生存的责任。当上层的统治失效或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使社会不公平达到威胁贫困者生存的程度时，或在部落遇到外敌侵扰时，民间的勇武之士会挺身而出，他们劫富济贫，或聚众为部落而战，从而赢得“巴特尔”的称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追随，成为新的首领。危难时刻，一些实力不足以自卫的部落会汇集在英勇善战的“巴特尔”麾下以求保护。“巴特尔”的功能既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同时也是哈萨克社会精英循环以及部落结构分化重组的一种机制。由于哈萨克社会按严格的父系血统建构，部落中任何一个男子都是部落始祖的子孙，都可以继承祖先的名号，因此，尽管部落内部重组时有发生，但这并不影响古老的部落名号的传承。“巴特尔”虽然深受广大牧民爱戴，并能英名世代远播，但多数命运多舛，不能善终，原因即在于他们虽然解决了部落社会的危机，但也直接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结构，因而为传统上层精英所不容。虽然传统部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联合、分裂和重组的过程中，但一般情况下参与其中的都是社会上层精英，而部落首领的地位取决于他所统领的部落的实力。战争时期部落中的巴特尔以及和平时期的阿肯²，是财富以外能够显示部落实力的两个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克烈部倾向新疆省政府，在杨增新的努力下，北洋政府续封克烈部的王公贵族，这使得克烈部落没有随科布多部加入蒙古独立运动而继续留在中国，阿巴克克烈一直是中国哈萨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方行政建制的设立，克烈部哈萨克各部落分属阿勒泰（今阿勒泰市，旧称承化）、吉木乃、布尔津、卡巴（今哈巴河）、青河、可可托海（今富蕴）和布鲁尔托海（今福海）七县（于维诚，2005:175-184）。

¹ 关于“比”的产生和职能，这里采用了笔者访谈中哈萨克学者的讲解。有关哈萨克社会的“比”和司法活动，苏北海先生在他的《哈萨克族文化史》中做了介绍（1989:361-372），但这种介绍没有与哈萨克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状况结合在一起，我们从中不能了解到“比”的产生和职能，也不知道哈萨克社会的这种法律实践发生在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结构层级中，更无法了解通过“比”这样的社会设置，哈萨克社会的社会联结性质是什么、社会政治生活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具体场域得以展现，也就无从判断哈萨克社会政治的属性。

² 阿肯可以简单意译为说唱艺人，但他们肩负的功能要远胜于农业社会中的艺人。他们既是信息传递者，事件的报道者，又是是非善恶的辩论者，还是历史的叙述者。经由阿肯，各部落之间展开话语权的竞争。阿肯在哈萨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下文还将论及。

到 1940 年代，阿巴克克烈内部仍然延续传统的部落体制，游牧于阿勒泰地区和准格尔盆地。在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部落头人的统治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中一个人的政治抉择和归属决定着其所统领的整个部落的立场和归属。而危难之中的巴特尔也是在传统部落社会的逻辑中涌现和行动，并且发挥着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功能。

（二）1940 年代克烈部落精英的三种选择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外蒙古独立并依附于苏联，阿勒泰地区的东西方向和北方处在苏联势力的包围之中，加上哈萨克各部落的传统牧地尚没有完全被国家边界所割裂，分布在中、苏、蒙三国交界地带的哈萨克社会的整体性依然存在，这就使得阿勒泰地区的克烈部落成为三国领土和主权角逐的角力场。

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力到达中亚哈萨克草原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政策以及集体化开始在中亚的哈萨克牧区强行推行。由于政策执行中不顾畜牧业生产规律，僵硬甚至蛮横，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牧民陷于贫困等问题。此时大批害怕失去畜产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哈萨克人迁移进中国境内。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感受和恐惧深刻影响了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畜产、信仰虔诚的人，由此形成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看法。与此同时，泛突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影响也在这一地区传播，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社会对抗来自西方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来自新疆当地军阀政府的盘剥的武器。

1930 年代末开始，由于反抗盛世才的“清枪”政策，哈萨克社会的上层精英遭到严重迫害，损失巨大。为了保卫社会精英，阿勒泰哈萨克人奋起反抗，与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省政府开战。这在对乌斯满的生平简介中已经提到过。盛世才被调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新疆事务并在新疆行使主权，应该是 1943 年底到 1944 年春才开始的事情。用张大军先生的观点来说，这时的新疆社会已经暗流涌动，国际局势益加险恶，而社会治理和国家管控却是青黄不接（张大军，1988：第十一卷）。就是在这种“青黄不接”的形势下，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于 1944 年夏在伊宁爆发，随后向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地区正处在军事换防和行政交接中的新疆省军、地方行政当局以及国民军展开军事行动，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简称“东突”）临时政府。在此期间，阿勒泰的哈萨克人曾联合起来参加了“东突”领导的军事行动。

在吴忠信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哈萨克上层、张治中主持展开建立“新疆省联合政府”的谈判之后，由于不满“东突”临时政府的“专横跋扈”和苏联对可可托海资源的开发，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分裂为继续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即谈判开始后被张治中称为“三区”的亲苏派和支持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亲中派，双方之间发生了战争（王珂，2013:296-8）。实际上，就阿勒泰地区来讲，自 1940 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首先是以包括福海、青河、富蕴三县的“上阿勒泰”哈萨克人为主的对盛世才的战争，随后发展为上、下阿勒泰联合的对新疆省政当局及国民政府的战争，紧接着又出现了亲苏的下阿勒泰与亲中的上阿勒泰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国家治理方式和战争中的生活状态的综合作用之下，阿勒泰克烈哈萨克社会的上层精英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

1、维护传统的合法性结构、在中国的政治框架中确定自己的地位。选择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艾林郡王夫妇、贾尼木汗等人，他们在参与国民党主导的七区政治及新疆省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2、加入中亚盛行的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争取“民族”独立。这批人在看到新疆局势被苏联方面主导之后逃亡土耳其，在 1940 年代的新疆地方政治舞台上没有突出的代表人物，但在后来的有关历史建构中成为一种在西方社会很有影响的力量。

3、加入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动社会革命，建立“自由美好的新社会”。选择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达列力汗。他是阿巴克克烈的第三大部落切如齐的台吉，于 1940 年代初秘密潜

入苏联，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和有关政治和军事训练，于1944年返回阿勒泰，逐渐成为阿勒泰哈萨克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阿勒泰地区西部的哈萨克参加了“三区革命”，早在1946年就赢得了解放¹。不幸的是，他也在1949年8月载着“三区革命”的领袖飞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却在中途神秘失事的那架专机上。

处在复杂的社会情境和变化莫测局势中的哈萨克社会精英，一般都受到多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加上他们的自身利益所在，多数处在骑墙观望状态。而所谓的骑墙观望，实际上也只能是在上列三条道路中的一种或某种组合中进行选择，而绝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新疆较量中，争取和稳定这些社会精英就成了各派力量斗争的主要角力场之一。

（三）乌斯满的位置及其与其他精英的互动

1、乌斯满的结构位置及其所具有的个人特征

上文已经提及，乌斯满是在阿勒泰哈萨克社会抵抗盛世才暴政的武装斗争中涌现出的来自民间的“巴特尔”，是一个草根精英人物，并不属于上文讨论的哈萨克社会上层精英。这是乌斯满在哈萨克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处在这种结构位置上的个体，他具有的价值观念、自我预期和行为方式都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或者反过来说更确切，只有那些价值观念、自我预期和行为方式符合社会的规定性的个体，才会处在某种特定的结构位置上。我们可以从部落社会结构和1940年代的具体社会情境这两个方面把民间“巴特尔”出身的乌斯满个人的社会特征进行归纳。

（1）基于部落社会结构的特征

在对乌斯满曾生活于其中的上阿勒泰人的口述史调查中，人们提到乌斯满的这样一些特征：他不是富人；他追随阿合提哈志，情同父子，宗教信仰虔诚；在年轻部落成员中他早年即表现出勇敢无畏的品性，受到人们的关注，部落成员对他有成为“巴特尔”的社会预期；他对自己的阿吾勒、追随者和部众有责任心，同情弱者疾苦，对朋友忠诚，道德品行端正；他遵守部落规则，是部落利益的勇敢、坚决的保卫者。从中可以看出，在传统的部落价值观念中，乌斯满是一个合格的“巴特尔”。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下阿勒泰的哈萨克民众，在说到乌斯满的时候，也承认“他是我们哈萨克的一只雄鹰”。

（2）基于现实社会互动情境的特征

但是，下阿勒泰人认为乌斯满站错了政治立场。这个“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哈萨克社会在所处政治环境中的抉择，也就是在上述三种精英选择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的交集。在地方具体的政治环境中，乌斯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在与各方的斗争中，乌斯满始终谨慎多疑，在“乌斯满的人”看来，这是他能够保护部落民众的重要品格，而其他方面的人则认为他保守多变。在他自己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宗教信仰和部落利益而战；而在当时的进步力量看来，他排斥社会革命，不了解体制化的现代国家和地方政治，因而是无知的、保守的和落后的。他在相互对立的各方力量之间寻求支持，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游移于各方之间，也先后被敌对的各方判定为背信寡义；他在战乱和流转过程中大肆抢劫，因而被哈萨克社会内部遭到抢劫的人们和外界视为匪盗。

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乌不过是一个封建部落式酋长人物，他的政治立场思想情况都是落后的，亦不能轻易相信他”（1985:537）。从苏联方面掌握的情报看，乌斯满是一个桀骜不驯、满脑子落后思想、一心想当阿勒泰“大汗”的破坏分子。在苏联希望新疆进入和谈

¹ 访谈中“达列力汗的人”都很自豪地提到这一点。对于上阿勒泰与下阿勒泰的这种差别，上阿勒泰人的解释是：上阿勒泰草场肥美、物产丰富，是阿勒泰的富裕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一直优于相对贫困的下阿勒泰地区。正因为上阿勒泰的富人多，他们保卫自己的私产的动力就会比下阿勒泰人更大，在文化和信仰方面也就更加保守，在社会革命时期就容易“落后”，甚至成为反革命。

局面时，为了制服这个破坏分子，贝利亚不得不给莫洛托夫写信，求他转请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乔巴山，让他出面制止“哈萨克的罗宾汉”¹的不轨行为（薛衔天，2009:155）。

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些基于传统阿洛斯部落价值从正面评价乌斯满的人，大多站在普通哈萨克牧民尤其是乌斯满所在部落牧民的立场上；而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其他各方，对乌斯满的评价则更多是负面的，大多引入了超越普通牧民生活实践的外在标准来进行评判。由此来解读当代哈萨克社会对乌斯满的评价“乌斯满巴特尔²是一只雄鹰，但是站错了立场”时，就会发现哈萨克人的历史智慧——基于部落社会当时所具有的价值立场和社会博弈的结果，败寇的结果并不能改变雄鹰的事实。

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在乌斯满的身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那些为 1940 年代的哈萨克社会大多数普通人所认同的传统文化因素。对这些普通人来说，乌斯满被按照哈萨克部落传统价值认定为“巴特尔”，乌斯满也按照传统的部落价值实践了自己的“巴特尔”身份。而那些普通哈萨克人与之互动的其他外在的各种社会力量，各自具有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社会互动目标，而不论以什么名义，这些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都不是 20 世纪 40 年代普通哈萨克牧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哈萨克牧民社会内生的。

2、乌斯满与其他精英的互动

在历时的宏大格局中看，乌斯满只不过是各方利用的一枚棋子，各方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好恶和得失来定义和使用这枚棋子，这个过程里的翻覆，其实与乌斯满政治立场的翻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乌斯满被处决已经 60 年，这种情况实际上至今仍在延续。但在历史的当下，乌斯满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他的所有选择都是出自于他的自由意志，他的行为的背景是赋予他行动能力的文化。我们可以从分析他与各种精英的互动中来看他所持有的文化和意义系统。

(1) 乌斯满与达列力汗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1906—1949 年）：哈萨克族，切如齐部落台吉。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1941 年赴苏联学习，1944 年 6 月回国，参与阿山游击队的领导工作。曾任阿山游击队总指挥、阿山地区副专员、三区政府委员，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卫生处处长、阿山地区专员、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等职。1949 年 8 月，在赴北平出席新政协协商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11）。

据受访者讲述，作为阿巴克克烈第三大部的切如齐部落的台吉，达列力汗的爷爷曾因在本部落争夺“比”的席位的竞争中失败而负气出走，越过克烈兀鲁斯扎萨克王直接归顺了科布多，从而造成了阿巴克克烈部的内部裂痕。乌斯满属于毛尔合部落，在传统上是忠实于克烈兀鲁斯扎萨克亲王的部落。据乌斯满的好友回忆，1943 年底，当乌斯满与外蒙古合作，成为阿勒泰地区势力最大的游击武装时，达列力汗的母亲找到了乌斯满的母亲——切如齐部落的女儿，请求乌斯满收留自己的儿子达列力汗。按照部落血缘传统，达列力汗与乌斯满是同一母系的表兄弟，乌斯满因此接受了达列力汗，并像兄弟一样对待他，让他负责指挥军事行动。乌斯满与达列力汗的合作促成了克烈部落的空前团结，在阿山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力量，在与新疆省军和国民政府军作战时势如破竹。这一细节解释了为什么达列力汗一回国就能获得乌斯满领导的阿山游击队的领导权。

但是，当乌斯满发现达列力汗具有鲜明的苏联背景，看到新建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也将推行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时，他便决心与达列力汗分道扬镳。他与达列力汗的冲突主要表

¹ 在西方文献中，源自英格兰民间传说中的“罗宾汉”是一个绿林好汉，后被比喻泛指那些不服从任何正统体制、但往往又能主持正义、深得底层社会拥护的草莽英雄，这样的人总是“麻烦制造者”。

² 在哈萨克人的日常口语中，提到乌斯满，都是用“乌斯满巴特尔”这个复合词指称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尊称，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对他的认知以及哈萨克社会对乌斯满的真实评价。另，在笔者对访谈中，不止一次听人们谈到，草原社会的巴特尔称号，没有一个是某一个人能够自封的，只有那些被社会公认为巴特尔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名衔。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待宗教的态度——乌斯满希望借胜利之际实行伊斯兰教法，而达列力汗代表的亲苏力量坚决抵制¹；二是苏联开采富蕴矿产是否合法——乌斯满不愿苏联势力染指上阿勒泰丰富的矿产，质疑经达列力汗默许的苏联开矿人员进入富蕴不符合外交程序；三是阿山地区的官员任命问题——夺取阿山地区后成立的行政公署中除乌斯满任专员、曾经追随乌斯满的一位切如齐部落的巴特尔任公安局长外，再没有乌斯满的其他部下出任公职，这使乌斯满极为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架空。

从引发冲突的三方面问题可以看到，乌斯满的立场是维护传统的宗教，他的政治理想是实行伊斯兰教法，他的现实利益关照是维护部落的土地权益和自己的追随者的实际利益。

在逐步脱离阿山专区，回到自己的家乡富蕴库拉特草原之后，乌斯满按照部落传统，召开了头人大会²，通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据说，在这次大会上，乌斯满讲道“我迷失了”³，表示要重新找回方向，请各部首领决定何去何从。也正是由于上述三种原因，阿勒泰地区的克烈部落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追随乌斯满的“上阿勒泰”与追随达列力汗的“下阿勒泰”的区隔，即上文提到的亲中派与亲苏派的分裂。双方于1946年初冬到1947年春兵戎相见。

在与达列力汗的互动中，乌斯满完全是按照部落传统行事的，他的行为方式反映出部落传统为他提供了分析和判断时事的方法。而他与达列力汗的互动也显示出，乌斯满是一个忠实于自己身处其中的传统文化的人。也可以说，相较于那些具有更多现代色彩的同时代哈萨克精英，乌斯满是一个更为传统、更缺少现代特征的保守人物。

(2) 乌斯满与艾林郡王

艾林郡王⁴的权威和影响力在1940年代已今非昔比，尤其在那些站在突厥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立场以及选择走苏联共产主义道路的人看来，尽管他的影响力尚可利用，但他实际上是投靠中国政府的反动分子和封建落后势力的代表。1944年，吴忠信主持新疆事务后，首批即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艾林郡王夫妇，并请艾林郡王出面宣抚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各部。据口述史调查资料，乌斯满在艾林郡王宣慰以后，即调整了他对于伊宁方面的态度，回到遵守阿巴克克烈与中国政府的“协议”的立场上来。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阿巴克克烈的王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效忠中国皇帝，向中国政府纳税，而中国政府允许阿巴克克烈迁到准格尔故地放牧，赋予其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据说，乌斯满认为遵守协议、保持克烈在阿勒泰地区和准格尔盆地的合法游牧权益符合部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才选择转向与国民政府合作。由此看来，在各种政治主张和势力

¹ 乌斯满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阿山地区哈萨克社会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1947年1月，“阿山专署召开宗教人士代表大会，决定用宗教法规来从事政治管理”（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212）。《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对阿山专区内部达列力汗与乌斯满的斗争的记述非常简略，以至于忽视了基本情节。但从可以用专署的名义通过这样的决定来看，即使达列力汗对此坚决反对也不得不暂时妥协。

² 口述史中的这次会议在《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中有记载：“1946年7月4日，阿山专署在富蕴县库威召开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解决阿山专署领导层的团结及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会议首先通过对1945年9月6日承化解放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律不予追究。对未经政府批准擅自越境从事贸易，没收其全部财产货物，并对本人给予严厉惩罚等八项决定。但由于乌斯满·斯拉木提出要用武力赶走可可托海的苏联采矿人员，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则认为苏联和蒙古同三区是友好的，提供了大量援助，对他们采用武力是不正确的。双方矛盾更加激化，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177-8）。

³ 据乌斯满的儿孙和好友解释，乌斯满自己所谓的“迷失”，包括在不清楚蒙古人的背景的情况下与其合作，受其唆使，自我膨胀，梦想自立为王，违背了克烈部落在阿勒泰安身立命的根本协议，即当年库库岱王与乾隆皇帝的协议；也包括他自己为保卫哈萨克社会的传统和信仰而战，但却与要消灭这些传统和信仰的人走到了一起。当然，这些也可能是乌斯满给自己找到的政治投机的借口。对于这一点，只有在深入研究了传统草原哈萨克社会的功利逻辑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分析，这是本文力不能及的。

⁴ “艾林郡王（1889—1961年）：本名艾林·莫斯汗。新疆吉木乃县人，哈萨克族。系柯勒依（即克烈，笔者注）部落头目。1915年受封为‘郡王’，是我国境内哈萨克族中获得爵位最高的上层人士。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委任其为省宣抚委员会副主任、阿山地区副专员。1945年9月逃往迪化。新中国建立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1961年在乌鲁木齐病逝”（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25）。

角逐新疆的环境中，乌斯满评判是非损益的标准可能是传统的部落意识，而不是当时已经颇具市场的泛突厥民族主义以及以民族主义作为知识背景的现代国家意识。

（3）乌斯满与贾尼木汗

贾尼木汗是克烈一部的台吉，曾任新疆省联合政府财政厅长。在乌斯满转向国民政府方面以后，曾向乌斯满下拨专款，他也是乌斯满往来最多的新疆省府官员。据“乌斯满的人”讲，由于贾尼木汗参与过盛世才与阿山哈萨克上层的谈判，曾帮助盛世才取得哈萨克民众的信任，但事后却没有为监督协议的履行承担责任，眼看着那些因为相信了他的担保而与盛世才合作的头人们遇害或被禁而无任何进一步表示。所以贾尼木汗在哈萨克人中的口碑并不好，乌斯满也并不信任他。但由于贾尼木汗的拨款，乌斯满有恩必报，在解放军进疆后的逃亡路上一直带着他，把他当作于己有恩的落难朋友对待，而根本没有去想与这样一个人为伍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从乌斯满与贾尼木汗的关系和他对贾尼木汗的态度来看，虽然乌斯满被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持有专员信印，并得到省政府的直接拨款，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进入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哈萨克上层，对政府的运作机制所知甚少，实际上依然是一个按照传统的“巴特尔”方式行事的草莽英雄。在乌斯满视野所及的部落传统政治与当代国家政治之间，有一道他无法跨越的鸿沟，尽管事后人们大都从当代国家政治的角度解释他的行为，但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乌斯满自己的知识世界和意识形态中可能并不存在这些东西。这也正是下阿勒泰人说他“无知”、“保守”、“落后”的依据。

（4）乌斯满与韩有文

乌斯满与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省外官员结为私人朋友的，应该说只有韩有文一人。在 1980 年代，时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韩有文还专程探望乌斯满的儿子乃比，表达了他对乌斯满的缅怀之情。韩有文是撒拉人，是 1945 年派驻新疆的青海马步芳麾下骑五军参谋长兼骑一师师长，进疆后驻防奇台，具体负责与乌斯满的联络和对乌斯满的物资供应。撒拉语亦属突厥语系，韩有文与乌斯满之间不用翻译可以交谈，且同为穆斯林，两人之间很快建立互信并成为好友，他们互赠马匹，韩有文拜访乌斯满时，会给乌斯满的家眷带礼物并与所有的家人都很熟络，乌斯满待他也犹如家人，整个阿吾勒都向他开放。在笔者所接触到的有关乌斯满的资料中，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与乌斯满的交往达到这种程度的外族人。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乌斯满的族际社会交往的选择性，文化认同的作用在这里显露无遗。他几乎只与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有深度社会交往。从交往范围看，他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超越部落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处理与他性命攸关的重要社会联系的关系时，他满足于通过自己信任的一个朋友，而不是试图直接与各种更高层的决策者建立个人关系，以此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访谈中，在谈到乌斯满与韩有文的关系时，人们假设，如果不是在和平解放的关键时期乌斯满与韩有文失去了联系，他的命运也许不会是落得一个遭枪决的反革命土匪的下场。

从他与其他各种人的互动中可以看到，乌斯满是一个典型的哈萨克社会传统中的“巴特尔”。他的自我意识和抱负都符合哈萨克传统。他带着全副传统的“装备”却落到了现代政治的舞台上，他的行为史可以被解读为社会动荡时期的“传统文化的行动史”。

3、什么样的传统需要“保护”或“捍卫”

口头宣示以“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为宗旨的苏维埃政权，对社会变革的实际取向却是消灭宗教、改变游牧社会的畜产所有权制度，而这两个目标直接指向哈萨克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和经济系统，这是苏联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动员和具体政策之间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在 1940 年代的中苏对峙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正是从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入手，来极力维持其在哈萨克社会中的影响力。在这种政治情境中，社会变革和保护传统就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文化保护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议题。

从乌斯满与其他各种哈萨克社会精英人物的互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有差异的、传统或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如何反映在 1940 年代人们的行为中。与乌斯满不同的是，其他那些

参与到 1940 年代阿勒泰地区社会政治互动中的精英人物都具有上层社会成员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文字工具，熟知部落政治技术，具有接受和选择外来知识文化的能力，视野更为开阔，可以率先感知外部世界的变迁并作出回应。

在游牧社会中，日常生产中的决策、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部落政治的博弈以及危难中的社会回应，都是由各级头人承担的，而头人们是在适应变动不居的自然环境和外部社会世界的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在游牧生产方式没有重大变化、社会的基础结构没有破坏的前提下，各级头人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行动者。正因为如此，在 1940 年代盛世才大量逮捕、迫害哈萨克社会精英的时候，底层民众中出现了“我们怎么活下去”的恐慌^{[4]35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乌斯满巴特，乌斯满呈现出了那个时代广大普通哈萨克人的人生境遇和他们的应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需要“保护”或“捍卫”的都是什么类型、为谁所持有、对谁才重要的东西。

三、文化议程的变迁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含义

1940 年代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对于生活在哈萨克社会中的个体来讲，是一个危在旦夕之间、事事生死攸关的年代。处在那种境遇中的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那些实力和智慧的较量抛弃了各种辞藻的华丽包装而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的确不存在文化保护议题。但这不等于说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之中。从个体的行动及其后果来看，文化在当时就是他们保命的本钱，个人的命运其实也就是被人们所持有的文化的命运。如果说文化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知识的和意义的框架，那么，这个框架是由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拆解和重组的，那些为人们所实践的文化，是动态的、鲜活的、因人因时而异的。因此，个体和群体的竞争，说白了，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的竞争。以今天的社会事实而论，“先进”战胜了“落后”，“现代”战胜了“传统”，我们似乎终于到达了先进的现代社会。

由于文化保护议题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来的议题，要认识这个议题的本相，我们还得回到历史中去追溯制造这个议题的过程。本文所讨论的，就是那些与今天的文化保护议题有关的社会事项在 70 年前所处的状态，试图以此对彰显这个议题的实质有所贡献。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再回到现实中来看当代的文化保护议题，也许我们能够读到其中蕴含的历史脉动。

在 1940 年代，整个哈萨克社会还没有纳入国家社会体系中，而在今天，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各个角落，哈萨克社会已经是国家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这个体系中有其特定的位置。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正在如潮水般无情地冲刷着每一个具有独特性的社会。今天哈萨克社会的文化保护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萨克人对他们自身的社会和历史处境的感受及应对。

在全面保护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启动以后，在全疆范围来看，哈萨克族选择了一个从社会学角度看具有重大结构意义的文化事项“阿依黛斯”作为本民族首要保护的项目，受到哈萨克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阿依黛斯”是哈萨克语音译，指阿肯的辩论、说理及历史讲述，作为文化保护项目，现已整理出版了广为阿肯们传颂的英雄史诗、哈萨克社会的道德伦理典范故事等。

阿肯是游吟于哈萨克各部落中的说唱艺人，他们论说时事、颂扬英雄、贬斥恶人、评论历史、左右舆论，实际上是传统哈萨克草原上传递信息、记录重大事件、营造共识和共同记忆的使者，受到社会的尊重。阿肯通常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主持正义，但同时又是本部落的代言人。所以，各部落的阿肯之间竞争激烈，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争夺道德评价和历史叙述的话语权，一个成功的阿肯会为整个部落赢得影响力。我们也可以说，“阿肯阿依黛斯”是一种为哈萨克社会所拥有的历史呈现的形式，其中蕴含着哈萨克社会的生机和自由。

在由阿肯们经过竞争来表述正义和叙述历史的社会结构中，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局面被有效遏制。战争中的胜利者未必能成为阿肯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阿肯的胜利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也是民意的选择。战争的失败者未必没有主张他们所坚持的正义及合法性的机会，他们还有阿肯，还有另外一个和平的战场。这种结构中，社会的价值观、历史上的是非曲直不会偏执于一方，不会沦为现实功利的工具，也不会陷于自相矛盾。这种性质的历史事实上能够容纳生活在历史中的所有人，而不是以一部分人的正义排斥另一部分人。也许这正是哈萨克游牧社会的政治组织可以分分合合、游移不定，但社会的整体性和历史的和谐却能得以保持的原因所在。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今天哈萨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也今非昔比。哈萨克人为了生存流转迁移的苦难历史也早已一去不复返。如果我们也从同样的问题——需要“保护”或“捍卫”的都是什么类型、为谁所持有、对谁才重要的东西——出发来观察这一文化保护行动，也许能对当代我国的哈萨克族人的处境理解更多，更能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今天的文化保护，并赋予其恰当的定位和理念。

当切如齐部落的阿肯和毛尔合部落的阿肯相遇，并且为同一群听众说唱的时候，只有哈萨克族人懂得他们的敌对、竞争、相惜和共谋，只有哈萨克族人知道珍惜这样的阿依黛斯的意义，因为只要有“阿肯阿依黛斯”，就有历史的天空。而生活在这种文化外面的人绝大多数不明就里却不自知，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向被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所束缚，不仅失去历史的天空，也让内心的怨恨阻挡了现实中的阳光。

参考文献:

- Benson, Linda, 1988, "Osman Batur: The Kazak's Golden Legend", in Linda Benson & Ingvar Svanberg, eds., *The Kazaks of China: Essays on an Ethnic Minority*. Stockholm: Uppsala, pp.141-87.
- 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1992，《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贾合甫·米尔扎汗，2001，《哈萨克族文化大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米尔斯，C. 赖特，1959，《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 苏北海，1989，《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孙隆基，2004，《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柯，2013，《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吴启纳，2006，《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和中国革命（1944—1962）》（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1995，《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编写组，198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薛衔天，2009，《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于维诚，2005，《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张大军，1988，《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一、十二卷，台北：兰溪出版社。
- 张治中，1985，《张治中回忆录》（下），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2010，《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 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调研报告】

美国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现状

励 轩¹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介绍美国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现状。介绍之前，有必要定义相关概念。这篇论文中，中国将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涉及到现代中国边疆地区研究时，将仅限于中国陆路边疆地区，即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和广西。而涉及到古代中国边疆地区研究时，我将沿用谭其骧先生的定义，以 18 世纪 50 年代至 19 世纪 40 年代之间的清代中国版图为限。²如此一来，便可将历史上与中原、东北、藏区及新疆关系极为密切的外蒙古划入本论文范围。因此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即是在美国从事与现代和古代中国边疆地区有关的研究。青海和四川藏区由于和西藏在文化有重要的联系，同时考虑到这两地在藏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尽管它们并不属于边疆地区，我也将从事与该两地有关的藏学学者纳入本论文的研究范围。

就目前美国学术界的现状来看，对中国边疆地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藏学、蒙古学、新疆学。美国藏学即在美国使用藏语或通过与藏区当地人互动来从事与藏区有关的研究，包括藏区的历史、宗教、政治、语言、文学、艺术、民俗。谢继胜先生曾在 2001 年发表的《国际藏学研究新动向——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一文中提及数位参加该次会议的美国学者以及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论文。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博士 2002 年在《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评述》一文中较为详细的介绍了美国藏学界 2000 年左右的状况。⁴之后，杜博士在《美国藏学研究和演变——以华盛顿大学的藏学研究为例》⁵和《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⁶两文中再次介绍了诸如 Melvyn C. Goldstein（梅尔文·戈尔斯坦）、Leonard W. van der Kuijp（莱纳德·范德康）、Elliot Sperling（艾略特·史伯岭）、Robert Barnett（罗伯特·巴奈特）。杜永彬博士的同事，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的索珍女士 2006 年发表了与其第一篇论文主题相同的文章《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⁷美国蒙古学即是在美国学习并使用蒙文或通过与蒙古人的互动来从事与蒙古相关的研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副教授 Christopher P. Atwood（克里斯托夫·阿特伍德）2008 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了《美国蒙古学学术传统》的演讲，定义了蒙古学家并介绍了美国蒙古学学术传统。⁸ Atwood 教授的学生中央欧亚研究系博士生蔡伟杰先生在 2012 年发表的《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一文中，介绍了美国蒙古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⁹美国新疆学即在美国使用新疆当地语言或通过与新疆当地人互动来从事与新疆有关的研究，至今并无相关汉语论文介绍美国的新疆学研究。美国清史学界由于不少研究涉及到边疆地区和中央的互动或者是对满洲发源地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因此也是本论文关注的对象。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党为先生在其 2010 年的博士论文《近三十年

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马戎教授、沈卫荣教授、蔡伟杰先生、贾建飞博士为本论文的修改提供了建议，在此致谢。

²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 年。

³ 谢继胜，“国际藏学研究新动向——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中国藏学》2001 年第 3 期：第 26-48 页。

⁴ 杜永彬，“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述评”，拉巴平措主编：《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年。

⁵ 杜永彬，“美国藏学研究和演变——以华盛顿大学的藏学研究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总第 219 期：第 18-28 页。

⁶ 杜永彬，“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中国藏学》2011 年第 S2 期总，第 89-96 页。

⁷ 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中国藏学》2006 年第 2 期，第 271-281 页。

⁸ Christopher P. Atwoo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S.A.,” Lecture given at Dankook University, Yongin, Gyeonggi Province, South Korea, October 29, 2008. “What distinguishes “Mongolists” from other academics who happen to study aspects of Mongolia or ethnic Mongols is the learning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using it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on the Mongolia and the Mongols.”（区别与其他研究蒙古或蒙古人的学者，蒙古学家学习蒙文并用它来研究蒙古和蒙古人。）

⁹ 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2012 年第二十一卷第三期，第 86-104 页。

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中介绍了美国清史学界部分涉及到中国边疆的研究。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张婷在《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一文中比较详细介绍了美国新清史的学者和他们的作品。²

尽管以上提到的论文都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现状，然而由于每篇论文均只介绍一个领域，这忽略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数位不同领域的美国学者同在一个研究单位从事与中国边疆地区有关的研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简称CEUS）和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IAAS）便是这种情况。本论文将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和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作为整体来介绍，以期使读者了解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中国边疆地区研究机构如何运作。此外，刚才所提及的论文中部分领域的信息已过时或未更新，而美国新疆学更是没有论文提及过，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予以提及或介绍。我也将提及超越蒙、藏、疆、东北领域的边疆地区研究学者及其作品，比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Thomas S. Mullaney（托马斯·墨磊宁）教授，也将提及涉及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却难以界定类别的学者，如宾夕法尼亚雪宾斯堡大学（Shippen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学系的Jonathon Skaff（乔纳森·斯卡夫）教授。

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简称CEUS）³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从1956年到1965年，这个项目被正式整合为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项目。⁴1962年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Denis Sinor（丹尼斯·塞诺）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并在1965年创立了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在塞诺教授带领下，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⁵1993年，在Christopher Beckwith（克里斯托夫·白桂思）教授担任系主任时，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中央欧亚研究系是美国高校中唯一一所致力于中央欧亚地区研究的系，目前可以提供古突厥文、察合台文、奥斯曼土耳其文、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雅库特语、蒙古语、古典蒙文、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匈牙利语、普什图语、波斯语、古伊朗语、塔吉克语、藏语、古藏文、藏文安多方言、满文等中央欧亚地区的语言文字课程。⁶由于该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近东语言文化系、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也提供汉语、阿拉伯语、俄语项目，这为中央欧亚研究系师生掌握相关研究性语言提供了便利。

涉及到中国边疆地区研究，中央欧亚研究系主要按照地区划分为三块，蒙古、藏区和新疆。György Kara（乔治·卡拉）⁷是该系匈牙利籍蒙古学教授。他在1961年获得匈牙利厄特沃什·

¹ 党为：《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² 张婷，“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一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367页。

³ 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的概念由Denis Sinor教授提出：Yet there is one, constant, special mark, characteristic of all the cultural areas located on what we may call the external boundaries of Eurasia, namely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ic basis. Between them,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distinct from them in this respect, lies the cultural area with which we are here concerned: Central Eurasia or, to use a less cumbersome though less accurate term, Inner Asia. Denis Sinor,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 Denis Sin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⁴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官方网站介绍》，<http://www.indiana.edu/~ceus/>，2013年7月25日

⁵ 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2012年第二十一卷第三期，第91页。

⁶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研究生课程表》，<http://www.indiana.edu/~ceus/courses/courselist.shtml>，2013年7月25日

⁷ 人名的汉文翻译，我将遵循如下原则：若学者本人有汉文名并可以在音译中反映，则在音译中译出汉文名，若不能，则在音译后添加其汉文名。

罗兰大学 1961 年获得匈牙利厄特沃 (EötvösLoránd University (ELTE), 1921 年称为布达佩斯大学) 博士, 师从著名蒙古学家 Lajos Ligeti (李盖提) 与突厥学家 Gyula Németh (1890-1976), 1967 年获得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学位候选人称号, 1975 年他获得苏联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语言学博士。Kara 教授自 1964 年起任教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内亚研究系, 后移居美国, 1988 年起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蒙古学教授。¹Kara 教授的研究兴趣是内亚地区的历史语言学, 包括古突厥文、藏文、满文、鄂温克语、契丹文、阿尔泰语文学及书写系统历史、阿尔泰语言学, 另外他也感兴趣于蒙古文学和民俗学。²他近年来的作品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³《蒙古秘史中的时间》,⁴《蒙古游牧者的文书: 八个世纪以来之蒙文书写史》。⁵

Christopher Atwood (克里斯托夫·阿特伍德) 是蒙古学副教授, 历史学系兼职教授。Atwood 教授 1986 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 1990 年硕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 专业蒙古学, 辅修藏学, 1994 年博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 专业蒙古学, 辅修历史学和东亚语言文化。其博士论文题为《1925—1929 年内蒙古革命民族主义动员》。1990 年—2008 年期间, 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翻译, 1996 年成为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助理教授, 2002 年起获聘副教授, 2007 年—2013 年期间担任中央欧亚研究系系主任。⁶ Atwood 教授的专长在蒙古近现代史, 但近来也集中于蒙古帝国史。其代表作有《内蒙古过渡时期 (1911-1933 年) 的蒙古青年与保安队》,⁷《蒙古和蒙古帝国百科全书》。⁸Atwood 的近著有《陶宗儀『説郛』と『聖武親征録』『蒙韃備録』のテキスト伝承》,⁹《中世纪中国的部落概念: 欧阳修和沙陀王朝神话》。¹⁰

Elliot Sperling (艾略特·史伯岭) 是藏学副教授。他 1973 年本科毕业于皇后学院 (Queens College), 1983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中央欧亚研究博士学位。¹¹加入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后, 他也曾担任系主任。Sperling 教授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 他对现代西藏事务有很大兴趣, 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就西藏事务的看法。他的作品有《西藏—中国冲突: 历史和问题》,¹²《瞿昙寺的历史和它跟明朝朝廷的关系》。¹³

Christopher Beckwith (克里斯托夫·白桂思) 是中央欧亚学教授, 1968 年本科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 1974 年硕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 专业藏学, 1977 年在印第

¹ 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2012 年第二十一卷第三期: 第 97 页。

²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 György Kara, <http://www.indiana.edu/~ceus/faculty/kara.shtml>, 2013 年 7 月 26 日

³ György Kara, *Dongfangxue yanjiusuo Shengpidebao fensuo shou zang Halahaote ji Xiyu chutu zhongshiji Mengguwen wenxian yanjiu*.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Ao Tegen.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2007.

⁴ György Kara, "Tim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 *Mongolian sudlalín ögüüllelin tüüwer. Olon ulsín mongol sudlalín xolbooní yörönxiilögč, professor Šigeo Ozawa doktorin 80 nasnı oid dzoriulaw* (Ulaanbaatar 2006), pp. 28-40

⁵ György Kara, *Bo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 More than Eight Centuries of Writing Mongolia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John R. Krueger. Revised and expanded by the autho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5. x+331pp., xxxviii plates

⁶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 Christopher Atwood 简历, <http://www.indiana.edu/~ceus/faculty/atwood.pdf>, 2013 年 7 月 26 日

⁷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2 vols (Leiden: Brill, 2002).

⁸ Christopher P. Atwood,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

⁹ Christopher P. Atwood, 陶宗儀『説郛』と『聖武親征録』『蒙韃備録』のテキスト伝承. Trans. MUKAI Masaki 向正樹, *Tōyōshien*. 77 (March, 2011), pp. 127-50.

¹⁰ Christopher P. Atwood, "The Notion of Tribe in Medieval China: Ouyang Xiu and the Shatuo Dynastic Myth," In *Miscellanea Asiatic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Françoise Aubin* ed. Denise Aigle, Isabelle Charleux, Vincent Goossaert, and Roberte Hamayon (Sankt Augustin: 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 2010), pp. 593-621.

¹¹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 Elliot Sperling, <http://www.indiana.edu/~ceus/faculty/sperling.shtml>, 2013 年 7 月 26 日

¹² 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¹³ Elliot Sperling, "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Gro-tshang Rdo-rje-'chang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ing Court," *Lungta*, (2000).

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取得内亚研究博士学位。¹Beckwith 教授是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兴趣在学术和科学方法史、早期中亚史、中央欧亚和东亚人类文化语言学史、历史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藏缅语、汉语、日本—高句丽语、突厥语）、理论音韵学、类型语言学、计算语言学。²他也曾担任过中央欧亚研究系系主任。Beckwith 教授的著作有《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³其近著有《修道院中的勇士：中世纪科学的中亚起源》，⁴《丝绸之路帝国：自青铜时代迄今的中央欧亚史》。⁵

Devin DeWeese（德温·德维西）是中央欧亚学教授，宗教系兼职教授。他 1985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DeWeese 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宗教和历史专家，学术兴趣在伊斯兰中亚和苏维埃中亚的区域研究、苏菲主义、伊斯兰化、宗教与内亚、伊斯兰圣徒传。⁶DeWeese 教授还可以使用察合台文进行研究并教授察合台文。他的代表作是《金帐汗国的本土宗教和伊斯兰化：历史和史诗传统中的巴巴·土尔克与皈依伊斯兰》。⁷他的近作有《伊朗、中亚、印度中世纪苏菲社会的精神修行和社团认同》，⁸《蒙古帝国的伊斯兰化》。⁹

Gardner Bovingdon（戈德纳·包文德）是中央欧亚学副教授，同时担任政治学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兼职教授。他 2002 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 Benedict Anderson。他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研究兴趣在当代新疆政治、现代新疆历史、中国的历史编撰学、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¹⁰Bovingdon 教授的近作有《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¹¹《现代新疆政治》。¹²

中央欧亚研究系现任蒙古语讲师是 Tserenchunt Legden 女士，她在 1996 年获得蒙古人文大学（University of Humanity）硕士学位。藏语讲师是 Gedun Rabsal 先生。维语讲师是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学家，她 1992 年于哈萨克斯坦维吾尔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Uyghurology）获得博士学位。

此外，印第安纳大学内还有三个与中央欧亚研究系有密切联系的机构：塞诺内亚研究所（The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中亚地区语言中心（Center for Languages of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s, CeLCAR）。塞诺内亚研究所建于 1967 年，原称亚洲研究所（The As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ASRI），1979 年改称内亚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¹ 本论文中，诸如“中央欧亚研究博士”或“历史学博士”等头衔并不是美国高校博士学位的正式称呼。此处，“中央欧亚研究”或“历史学”只代表学者攻读博士时的专业或专业方向。

²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Christopher Beckwith, <http://www.indiana.edu/~ceus/faculty/beckwith.shtml>, 2013 年 7 月 26 日

³ Christopher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⁴ Christopher Beckwith, *Warriors of the Cloisters: The Central Asian Origins of Science in the Medieval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⁵ Christopher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⁶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Devin DeWeese, <http://www.indiana.edu/~ceus/faculty/deweese.shtml>, 2013 年 7 月 26 日

⁷ Devin DeWeese, *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Baba Tükles and Conversion to Islam in Historical and Epic Traditi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⁸ Devin DeWeese, “Spiritual Practice and Corporate Identity in Medieval Sufi Communities of Iran, Central Asia, and India: The Khalvatī/Ishqī/Shā‘arī Continuum,” in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 South Asia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Olivelle*, ed. Steven Lindquist (New York/London/Delhi: Anthem Press, 2010), pp. 251-300.

⁹ Devin DeWeese, “Islamization in the Mongol Empi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ed. Nicola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0-134.

¹⁰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Gardner Bovingdon, <http://www.indiana.edu/~ceus/faculty/bovingdon.shtml>, 2013 年 7 月 26 日

¹¹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¹² Gardner Bovingdon, “Politics in Modern Xinjiang,” i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hina*, ed. William Josep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6-354.

Studies, RIFIAS), 2007 年改为现名。塞诺内亚研究所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 致力于鼓励和支持内亚领域的所有学术研究, 目前这个研究所已建立一个保存跟内亚有关的书籍、微缩胶卷、手稿等资料的图书馆。¹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前身是 1962 年搬到印第安纳大学的乌拉尔和阿尔泰语言与地区中心 (Uralic and Altaic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 1981 年改为现名。²它是美国教育部标题六 (Title VI) 受援机构, 旨在协调相关资源以促进对内亚和乌拉尔地区多样化区域和人民的全方位了解。³中亚地区语言中心成立于 2002 年, 它是美国十四个标题六 (Title VI) 外国语言资源中心之一, 也是美国唯一一个专注于中亚 (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语言的中心。中亚地区语言中心致力于促进美国的中亚语言文化教育和学习, 也开发语言学习工具包括教材、多媒体资源等, 还承担教师培训、远距离教学、暑期学校开设等责任。这个中心可以开设在美国不常被教授的中亚地区语言课程诸如达力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蒙古语、普什图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中心的主要资助来自美国教育部、印第安纳大学文理学院、美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⁴以上三个机构的主管一般都由中央欧亚研究系教授担任, 前两个机构的主管均是 Edward Lazzarini (爱德华德·拉兹瑞尼) 博士, 中亚地区语言中心主管是 Öner Özçelik (于奈尔·于兹切利克) 博士。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 (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 IAAS) 成立于 1972 年, 旨在推动和整合内亚和阿尔泰地区文化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与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不同,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委员会是由哈佛大学各系相关领域教授组成的项目, 现有三位涉及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 分别是藏学家 Leonard W. van der Kuijp (莱纳德·范德康)、Janet Gyatso (珍妮嘉措) 以及清史专家 Mark C. Elliott (马克·艾略特, 汉文名欧立德)。

Leonard W. van der Kuijp (莱纳德·范德康) 是哈佛大学南亚研究系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 同时也担任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 目前兼任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主席。范德康教授 1983 年从德国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为《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⁵他的主要兴趣在藏传佛教以及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西藏历史、文化和文明。⁶范德康教授的近著有《仍在寻求佛法: 十五世纪西藏的印度和锡兰旅行者》。⁷

Janet Gyatso (珍妮嘉措) 是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歇佛教学教授 (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高等教育, 1972 年获得宗教学学士学位, 1974 年获得梵文硕士学位, 1981 年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在正式加入哈佛大学神学院之前, 她曾在阿默斯特学院宗教系任教。⁸她的专长在佛教学, 特别专注于西藏和南亚文化与思想史。⁹她的作品有《西

¹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塞诺内亚研究所: 塞诺内亚研究所介绍, <http://www.iu.edu/~srifias/about/>, 2013 年 7 月 26 日

²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 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介绍, <http://www.indiana.edu/~iaunrc/about>, 2013 年 7 月 27 日

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 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 <http://www.indiana.edu/~iaunrc/>, 2013 年 7 月 27 日

⁴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亚地区语言中心: 中亚地区语言中心简介, <http://iub.edu/~celcar/about.php>, 2013 年 7 月 27 日

⁵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 Leonard W. van der Kuijp 简历, <http://harvardale.org/resumes/db290a79f312c6f8e292d446ada41a9a.pdf>, 2013 年 7 月 27 日

⁶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 IAAS Committee Members, <http://iaas.fas.harvard.edu/pages/iaas-committee-members>, 2013 年 7 月 27 日

⁷ Leonard W. van der Kuijp, *Still in Search of Dharma: Indian and Ceylonese Travelers in Fifteenth Century Tibet*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9) .

⁸ 哈佛大学神学院: Janet Gyatso 简历, http://www.hds.harvard.edu/sites/hds.harvard.edu/files/gyatso_cv_aug2011.pdf, 2013 年 7 月 27 日

⁹ 哈佛大学神学院: Janet Gyatso, <http://www.hds.harvard.edu/people/faculty/janet-gyatso>, 2013 年 7 月 27 日

藏的鬼怪：一个西藏幻想家的秘密自传》，¹《辨识西藏现代性：契机、方法和设想》。²

Mark C. Elliot (马克·艾略特，汉文名欧立德) 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马克·史沃慈中国和内亚史教授 (Mark Schwartz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欧立德教授 1981 年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专业历史学，1984 年硕士毕业于耶鲁大学，专业东亚研究，1993 年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业历史学。³欧立德教授以其推动满学研究而著名，是新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之一，代表作品有《满洲之道：中华帝国晚期的八旗和族群认同》，⁴ 近著有《天之骄子乾隆帝》。⁵

尽管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只是一个项目，然而进入这个项目的学生还是可以通过选修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相关语言课程来完成自己语言技能的积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可以提供满语、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课程。⁶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 (The UVA Tibet Center) 是由该校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目前美国藏学家最密集的研究机构。1960 年代，由于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分部主管 Gene Smith (吉恩·史密斯) 的先见之明和南亚目录学家 Richard Martin (理查德·马丁) 的帮助，弗吉尼亚大学成为公共法案 480 项目 (Public Law 480 program) 受惠者，这个法案允许美国研究机构从印度获得藏文图书资料以换取美国政府减免印度的欠债。之后，该校阿尔德曼图书馆 (Alderman Library) 藏文文本收藏稳步增长，成为 1973 年吸引第一位藏学家 Jeffrey Hopkins (杰弗里·霍普金斯) 来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原因。此后，弗吉尼亚大学佛教学和藏学项目建立，在接下来三十年，Hopkins 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以这些藏文文献为基础写出他们的论文，从而让非专业学者能够依靠他们的翻译来了解这些文献。在 Hopkins 教授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研究稳步前进，并且又吸引了数位藏学家加入。特别是 1992 年藏学家 David Germano (戴维·杰玛诺) 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将原先的语文学传统扩展到了文学、历史和社会问题。Germano 教授加盟后，越来越多的藏学研究生开始学习汉语，并去中国藏区做田野调查而非仅局限于印度和尼泊尔。在 Hopkins 教授和 Germano 教授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大学藏学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ibetan Studies) 在 1998 年成立。Germano 教授还和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人文领域先进技术研究所 (Institute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一起努力建立了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 (Tibetan and Himalayan Library)，这个图书馆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藏学领域数字化图书馆。2008 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家们组建西藏中心。与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类似，这个中心的教授也来自弗吉尼亚大学各系。⁷

Jeffrey Hopkins (杰弗里·霍普金斯) 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藏传佛教荣休教授，他是弗吉尼亚大学佛教学项目的创始人，也曾担任过十二年的南亚研究中心主管，从 1979 年至 1989 年，亦担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国际巡回演讲的英文翻译。Hopkins 教授 1963 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1973 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他的兴趣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和

¹ Janet Gyatso, *Apparitions of the Self: The Secret Autobiographies of a Tibetan Visiona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² Janet Gyatso, "Discerning Tibetan Modernities: Moments, Methods, Assumptions," In *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 ed. Gray Tuttle (Leiden: Brill, 2011) , pp. 1-37.

³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 Mark C. Elliot 简历, http://scholar.harvard.edu/elliott/files/mce_cv_mid_012113_0.pdf, 2013 年 7 月 27 日

⁴ 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⁵ Mark C. Ellio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Longman/Pearson, 2009) .

⁶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 Courses of Instruction, <http://www.registrar.fas.harvard.edu/east-asian-languages-and-civilizations>, 2013 年 8 月 1 日

⁷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 The History of Tibetan Studies and Tibet Engagement at UVA, 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26, 2013 年 7 月 27 日

觉囊派，主要从事蒙藏学者所写藏文文本的分析性阐述、注释、翻译以及藏族学者口头演讲和藏语材料的编辑翻译。¹Hopkins 的近著有《密教技术》，²《真实的心：连接他者的佛教修行》。³

David Germano（戴维·杰玛诺）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藏学和佛教学教授，现任西藏中心主管。他1984年本科毕业于圣母大学，1992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Germano 教授的兴趣在藏传佛教宁玛派和苯教传承、密教传统、公元八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佛教哲学和修行、西藏历史和文学、当代西藏的宗教、教育和技术、数码人文领域等。⁴他的近作有《回想起西藏分裂的躯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当代西藏幻想运动》。⁵

Karen Lang（凯伦·莱恩）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佛教学和印度宗教教授，她同时担任南亚研究中心主管。Lang 教授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和翻译兴趣是公元七世纪佛教哲学家月称的作品。⁶她的译作有《四幻想：月称对菩萨道行者的建议》，⁷近作有《奎师那沿岸大乘佛教的两个发展》。⁸

Kurtis Schaeffer（柯蒂斯·薛富尔）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教授。他在1995年从华盛顿大学获得佛教学硕士学位，200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西藏和南亚宗教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印度、尼泊尔、中国特别是西藏的宗教史。Schaeffer 教授目前从事达赖喇嘛史和西藏传记史的研究。⁹他的近著有《西藏的书文化》。¹⁰

除了以上教授，西藏中心还有一位藏语讲师Tsetan Chonjore。Chonjore 先生目前担任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文化系藏语主管，他1978年在圣约瑟夫学院（St. Joseph's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¹¹

凯斯西储大学西藏研究中心

凯斯西储大学西藏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ibet,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成立于1987年。中心目标是研究西藏历史、社会、语言、生态以理解传统西藏及它变化的方式。这个中心设在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藏学家 Melvyn C. Goldstein（梅尔文·戈尔斯坦）和人类学家 Cynthia M. Beall（辛西娅·柏尔）是中心的联合主管，目前该中心有三位职员。¹²

Melvyn C. Goldstein（梅尔文·戈尔斯坦）是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约翰·莱诺德·哈克尼斯人类学教授（John Reynolds Harkness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他1959年和1960年分别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Goldstein教授在

¹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Jeffrey Hopkins简历，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933，2013年7月27日

² Jeffrey Hopkins, *Tantric Techniques*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9) .

³ Jeffrey Hopkins, *A Truthful Heart: Buddhist Practices for Connecting with Others*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8) .

⁴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David Germano 简历，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699，2013年7月27日

⁵ David Germano "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Body of Tibet: Contemporary Tibetan Visionary Move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bridged version published in *Defining Buddhism: A Reader* edited by Karen Derris and Natalie Gummer in the series "Critical Categorie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edited by Russell T. McCutcheon for Equinox Publishing, 2007.

⁶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Karen Lang 简历，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780，2013年7月27日

⁷ Karen Lang, *Four Illusions: Candrakirti's Advice for Travelers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⁸ Karen Lang, "Two Mahayana developments along the Krishna River," In *Buddhism in the Krishna River Valley of Andhra*, eds. Sree Padma and A. W. Barb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

⁹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Kurtis Schaeffer简历，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785，2013年7月27日

¹⁰ Kurtis Schaeffer,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¹¹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setan Chonjore简历，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940，2013年7月27日

¹² 凯斯西储大学西藏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ibet, http://www.case.edu/affil/tibet/aboutUs/center_info.htm, 2013年7月28日

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¹他的主要兴趣在家庭和婚姻、跨文化和全球老龄化、人口研究、文化生态和经济发展。²虽然Goldstein教授出身人类学，但他却是美国最有名的西藏现代史专家，他的《西藏现代史》³拥有很好口碑。他编撰的《现代藏语藏英词典》⁴也给他带来了极高声誉。

Cynthia M. Beall（辛西娅·柏尔）是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杰出大学教授。她1970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1972年和1976年分别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Beall教授1996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⁵她研究人类特别是安第斯、西藏和东非⁶高原居民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她的近作有《西藏的基因变化》。⁷

Tsewang Namgyai Shelling先生是西藏研究中心的第三位职员。他在1954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之后在印度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院学习了两年英文。Shelling先生是藏语和西藏历史专家，通藏、汉、英三语，曾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西藏研究中心藏英词典项目的编辑，他还曾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翻译成藏文。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是西方第一个致力于教授现代西藏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项目，得到了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⁸目前，这个项目有两位藏学教授 Robert Barnett（罗伯特·巴奈特）和 Gray Tuttle（格雷·托特）以及一位藏语讲师 Tenzin Norbu Nangsal 先生。

Robert J. Barnett（罗伯特·巴奈特）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研究员，当代西藏研究助理教授，并兼任现代西藏项目主管。Barnett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创始人，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是一位活跃的记者，至今还为BBC、CNN、NPR、CB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稿，其兴趣在中国民族问题。⁹其近著有《西藏现代性：文化和社会变化领域的笔记》。¹⁰

Gray Tuttle（格雷·托特）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蕾拉·哈德勒·鲁斯现代藏学教授（Leila Hadley Luce Professor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他2002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Tuttle教授研究二十世纪的汉藏关系史以及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¹¹其著作有《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¹²

¹ 凯斯西储大学：Melvyn C. Goldstein 简历，

<http://www.case.edu/affil/tibet/documents/CurriculumVitaeDr.MelvynGoldstein4-3-2013.pdf>，2013年7月28日

² 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Melvyn C. Goldstein, <http://www.case.edu/artsci/anth/goldstein.html>, 2013年7月28日

³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第二卷也已出版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Two, 1951-1955: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第三卷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Three, 1955-1957: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预计2013年10月出版，目前 Goldstein 正在创作第四卷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Four, 1957-1959: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⁴ Melvyn C. Goldstein,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Kathmandu: Biblioteca Himalaya Series, II, Vol. 9., 1975).

⁵ 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Cynthia M. Beall 简历，

<http://www.case.edu/artsci/anth/documents/Beallcv-public4-4-2012.pdf>，2013年7月28日

⁶ 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Cynthia M. Beall, <http://www.case.edu/artsci/anth/Beall.html>，2013年7月28日

⁷ Cynthia M. Beall, "Genetic changes in Tibet," *High Alt Med Biol*, 12, 2. (2011):101-2.

⁸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项目：现代西藏项目介绍, <http://www.columbia.edu/cu/weai/modern-tibetan-studies.html>, 2013年7月27日

⁹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Faculty, <http://www.columbia.edu/cu/weai/tibetan-faculty.html>, 2013年7月27日

¹⁰ Robert Barnett and Ronald Schwartz, eds., *Tibetan Modernities: Notes from Field on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Leiden: Brill, 2008).

¹¹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Faculty, <http://www.columbia.edu/cu/weai/tibetan-faculty.html>, 2013年7月27日

¹²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现代西藏项目的藏语讲师 Tenzin Norbu Nangsal 先生 1990 年毕业于西藏大学。¹

除去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院系和研究所。接下来本文将逐一介绍相关学者。

蒙古学

Alicia J. Campi (艾丽西亚·坎皮) 是现任美国蒙古学会 (The Mongolia Society) 会长及美蒙顾问团团长与执行总监。她 1969 年本科毕业于史密斯学院 (Smith College)，1973 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与蒙古学硕士，1987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 (现中央欧亚研究系) 获得博士。她主要研究蒙古近现代史和蒙古的国际关系。²她的作品有《中国和俄罗斯对二十世纪美蒙关系的影响》。³

Johan Elverskog (约翰·艾尔弗斯柯克) 现任南美以美大学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宗教研究系教授和系主任。他分别在 1995 年与 2000 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硕士与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蒙古与佛教史，最近也关注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互动。⁴Elverskog 教授的近著有《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和伊斯兰教》。⁵

Timothy May (提慕斯·梅) 现任北乔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 (North Georgia College & State University) 历史与哲学系中央欧亚和中东历史教授，并担任系主任。他 1993 年从威廉玛丽学院历史和人类学专业本科毕业，1996 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硕士，2004 年获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历史学博士。May 教授主要兴趣在蒙古帝国史、中央欧亚和中东历史比较研究。⁶他的作品有《蒙古的战争艺术：成吉思汗和蒙古军事系统》，⁷《世界史中的蒙古征服（公元 1200—1350 年）》。⁸

Jonathan Schlesinger (约翰逊·史勒辛格) 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在 2012 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Schlesinger 教授主要兴趣在清代蒙古史和环境史。⁹他的近作有《清代蒙古史中的黄金政治》。¹⁰

藏学

Robert Thurman (罗伯特·瑟曼) 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印藏佛教学教授 (Jey Tsong khapa Professor of 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Thurman 教授 1972 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前，他在阿默斯特学院担任宗教学教授。他曾出家成为一名藏传佛教僧人，并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师。1987 年，他和 Richard Gere (理查德·基尔)、Philip Glass (菲利普·格拉斯) 一起创立非盈利机构西藏之家 (Tibet House)，该机构致力于保护和复兴西藏文明。目前他担任西藏之家主席和哥伦比亚大学佛教学中心附属的美国佛教学研究所主席。他的专

¹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Faculty, <http://www.columbia.edu/cu/weai/tibetan-faculty.html>, 2013 年 7 月 27 日

² 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2012 年第二十一卷第三期：第 97 页。

³ Alicia J. Campi, *The Impact of China and Russia on United States-Mongolian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

⁴ 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2012 年第二十一卷第三期：第 98 页。

⁵ Johan Elverskog, *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

⁶ 北乔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历史与哲学系：Timothy May 简历, , <http://faculty.northgeorgia.edu/TMMay/CURRICULUM%20VITAE.pdf>, 2013 年 7 月 28 日

⁷ Timothy May, *The Mongol Art of War: Čhinggis Khan and the Mongol Military System* (Yardley: Westholme, 2007) .

⁸ 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C. 1200-1350)* (London: Reaktion Book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⁹ 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Jonathan Schlesinger, http://www.indiana.edu/~histweb/faculty/Display.php?Faculty_ID=153, 2013 年 7 月 28 日

¹⁰ Jonathan Schlesinger and Mette High, "Rulers and Rascals: The Politics of Gold in Qing Mongolian History," *Central Asian Survey*, 29, 3. (2010) : 289-304.

长在藏传佛教，但也会就政治议题发声。¹他的作品有《五次第明灯》，²《为什么达赖喇嘛重要：他为中国、西藏和世界提供的方案》。³

Donald Lopez（唐纳德·洛佩兹）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A.E.林克杰出大学佛教学教授（A.E. Link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他同时担任该系主任。Lopez教授1982年获得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主要研究印度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欧洲人与佛教的遭遇，亦从事佛经翻译工作。⁴Lopez教授的作品有《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⁵《西藏死亡书：一个传记》。⁶

Carole McGranahan（卡萝尔·麦格拉罕）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她1991年在柯盖德大学（Colgate University）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1999年和2001年在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人类学硕士和人类学及历史学博士学位。⁷McGranahan教授的兴趣在当代西藏，特别关注如下议题：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和记忆、难民和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归属感、性别、战争等。⁸她的著作有《遭俘获的历史：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回忆被遗忘的战争》。⁹

Holly Gayley（郝莉·伽蕾）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宗教学系助理教授。她2000年在那若巴大学（Naropa University）获得佛教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藏的宗教、宗教现代性、佛教圣徒传。¹⁰她的近作有《吃猴脑：藏传佛教徒素食主义观点中对中国宴会的异化》。¹¹

Emily T. Yeh（艾米丽·叶，汉文名叶婷）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系副教授。她1993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1995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硕士学位及技术和政策项目硕士学位，200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方向能源和资源团体。¹²Yeh教授的兴趣在自然—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政治经济、文化政治问题，她的主要田野调查地点是西藏。她也对流亡藏人的种族和认同政治感兴趣。¹³其作品有《从荒地到湿地：中国西藏的自然和国家》。¹⁴

Nancy E. Levine（南希·列维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她在1978年从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Levine教授的兴趣在亲缘关系和家庭经济、人口统计学、社会变化、

¹ Robert Thurman 官网：<http://www.bobthurman.com/bio.php>，2013年7月28日

² Robert Thurman, *Brilliant Illumination of the Lamp of the Five Stages: Practical Instructions in the King of Trantras, The Glorious Esoteric Community* (NY: AIBS/CBS/THUS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2012) .

³ Robert Thurman, *Why the Dalai Lama Matters: His Act of Truth as the Solution for China, Tibet, and the World* (NY and Portland: Simon & Schuster Atria /Beyond Words Books, 2008) .

⁴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 Donald Lopez, http://www.lsa.umich.edu/asian/aboutus/faculty/ci_lopezdonald_ci_detail，2013年7月28日

⁵ Donald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⁶ Donald Lopez,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⁷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人类学系: Carole McGranahan 简历, <http://www.colorado.edu/anthropology/people/bios/uploads/McGranahan/McGranahanCV2013.pdf>，2013年7月28日

⁸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人类学系: Carole McGranahan, <http://www.colorado.edu/anthropology/people/bios/mcgranahan.html>，2013年7月28日

⁹ Carole McGranahan, *Arrested Histories: Tibet, the CIA, and Memories of a Forgotten W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¹⁰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Holly Gayley, <http://rlst.colorado.edu/content/gayley-holly>, 2013年7月28日

¹¹ Holly Gayley, "Eating Monkey Brains: Exoticizing the Chinese Banquet in a Tibetan Buddhist Argument for Vegetarianism," paper presented on a panel that was co-organized on "The Culinary in Buddhism: Miracles, Medicine & Monstrosity"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conference held in San Francisco on November 19–22, 2011.

¹² 科罗拉多大学: Emily Yeh 简历, <http://spot.colorado.edu/~yehe/yeh-CV-sept09-webpage.pdf>，2013年7月29日

¹³ 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 Emily Yeh, http://geography.colorado.edu/people/faculty_member/yeh_emily

¹⁴ Yeh, Emily T, "From wasteland to wetland? Nature and nation in China's Tibet,"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 1. (2009) : 103-137.

性别、西藏和中亚。¹其作品有《一妻多夫的机制》。²

Patricia Berger（派翠希娅·伯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副教授，并担任该系主任。她1969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绘画学士学位，1973年和198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获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学位。³她的兴趣在清代艺术史，其作品有《空性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⁴

Jacob P. Dalton（雅各布·达尔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双聘副教授。他在1992年从万宝路学院（Marlboro College）获得宗教研究学士学位，后分别在1995年和2002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佛教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他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也在大不列颠图书馆作为研究员参与过国际敦煌项目。Dalton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传佛教。⁵他的作品有《驯服魔鬼：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放》，⁶《超越匿名：对敦煌手稿的古文书学分析》。⁷

José Ignacio Cabezón（乔什·伊戈纳西欧·卡白宗）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和文化研究教授。他在197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佛教学博士学位。⁸ Cabezón的兴趣在用理论范式和解释学而非传统语文学来理解藏传佛教。⁹他的著作有《佛教和语言：印藏经院哲学研究》¹⁰。

David Gray（戴维·格雷）是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宗教学系副教授。他1993年从卫斯理大学获得宗教学学士学位，200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宗教史和佛教学博士学位。¹¹他研究南亚密教以及他们在西藏和东亚的传播。¹² Gray教授的作品有《胜乐金刚：研究和注释翻译》。¹³

George Dreyfus（乔治·德雷伊弗斯）是威廉姆斯学院宗教系教授（Jackson Professor of Religion），他在1985年获得西藏寺庙教育体系中的拉然巴格西学位（Geshe Lharampa），1991年获得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史博士学位。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思维哲学、认知过程研究、意识理论、印度佛教哲学、宗教和现代性研究。¹⁴他的作品有《自我和主观性：中间道路》。¹⁵

Bryan J. Cuevas（布莱恩·古艾瓦斯）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宗教系约翰·F·普利斯特宗教学教授（John F. Priest Professor of Religion）。他在2000年获得佛吉尼亚大学宗教学博士学位。Cuevas

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Nancy Levine, <http://www.anthro.ucla.edu/people/faculty?lid=269>, 2013年8月1日

² Nancy Levine, *The Dynamics of Polyand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atricia Berger 简历, http://arthistory.berkeley.edu/documents/faculty_cv/PSBergerCV-06.pdf

⁴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⁵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acob P. Dalton 简历, http://sseas.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faculty/dalton_cv.pdf, 2013年7月29日

⁶ Jacob P. Dalton, *Taming of the Demons: Violence and Liber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⁷ Jacob P. Dalton, "Beyond Anonymity: Paleographic Analyse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authored with Tom Davis and Sam van Schaik.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no.3 (2007): 1-23.

⁸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José Ignacio Cabezón 简历, http://www.religion.ucsb.edu/wp-content/uploads/Jose_Cabezón_CV.pdf, 2013年7月28日

⁹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José Ignacio Cabezón, http://www.religion.ucsb.edu/?page_id=570, 2013年7月28日

¹⁰ José Ignacio Cabezón, *Buddhism and Language: A Study of Indo-Tibetan Scholasticism* (Albany: SUNY Press, 1994).

¹¹ 圣塔克拉拉大学宗教研究系：David Gray 简历, <http://www.scu.edu/docs/images/rte/shared/GrayCV.pdf>, 2013年7月29日

¹² 圣塔克拉拉大学宗教研究系：David Gray, <http://www.scu.edu/cas/religiousstudies/facultystaff/Regular/gray/>, 2013年7月29日

¹³ David Gray, *The Cakrasamvara Tantra: A Study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¹⁴ 威廉姆斯学院宗教系：George Dreyfus, <http://religion.williams.edu/faculty/georges-dreyfus>, 2013年7月28日

¹⁵ George Dreyfus, "Self and Subjectivity: a Middle Way Approach," in *Self, No Self? Perspectives from Analytical, Phenomenological, and Indian Traditions*, ed. Mark Siderits, Evan Thompson, and Dan Zahav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教授的专长在藏传佛教和喜马拉雅宗教、西藏历史、语言和文化。目前他专注于西藏历史和历史编撰学、死亡社会史和与死亡相关的修行、大众佛教、中世纪西藏社会的宗教权力政治。¹他的近著有《阴间的旅行：西藏佛教对死亡和来世的大众叙述》。²

A. Tomasz Grunfeld³（谭·戈伦夫）是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杰出教学教授。他从纽约州立大学欧德韦斯特伯里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Old Westbury）获得学士学位，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纽约大学分别获得远东研究硕士学位和现代中国史博士学位。Grunfeld教授的专长在中亚和东亚研究。他也常在媒体上就中国、西藏和美国的关系⁴及美国对西藏独立运动的政策等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⁵其著作有《现代西藏的诞生》。⁶

Paul Nietupski（保尔·奈特普斯基）是约翰·卡罗尔大学（John Carroll University）神学和宗教学系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亚洲宗教博士学位。⁷Nietupski教授的兴趣在内亚历史、宗教和文化以及中世纪印度佛教和它向西藏和东南亚的传播，他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地点一般在甘肃藏区。⁸其作品有《拉卜楞寺：内亚边疆的藏传佛教社会，1709-1958》。⁹

Tashi Rabgey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事务研究教授。她之前曾在弗吉尼亚大学东亚中心任职，是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的联合主管。她从多伦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士学位，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获得法学硕士和国际法律硕士，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和法律人类学。Rabgey教授的专长在国际法理论和领土政治、中国的立宪制度和民族法律、西藏的公共政策和治理、汉藏关系。她现在专注于最近中国民族法律和政策的发展。¹⁰Rabgey教授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的幽灵：后民主化台湾的西藏法律承认和主权政治》¹¹，还著有《后毛泽东时期的汉藏对话：教训和前景》。¹²

Christian K. Wedemeyer（克里斯·怀德迈尔）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史副教授，兼任南亚语言文明系副教授。他1991年获得卫斯理大学学士学位，专业为哲学和宗教，1994年和1999年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硕士和博士学位。¹³Wedemeyer教授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理论和方法、宗教和文化的现代学术史、佛教历史、文本和仪轨问题。¹⁴其作品有《说通密教：历史、记号学和对印度传统的违背》。¹⁵

¹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宗教系：Bryan J. Cuevas, http://religion.fsu.edu/faculty_bryan_cuevas.html, 2013年7月28日

² Bryan J. Cuevas, *Travels in the Netherworld: Buddhist Popular Narratives of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in Tib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³ 他的名字也常以 A. Tom Grunfeld 出现。

⁴ 原文如此。

⁵ 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A. Tomasz Grunfeld, https://empire2.esc.edu/esconline/across_esc/experts.nsf/expertslist/ATomGrunfeld.html, 2013年8月1日

⁶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6) .

⁷ 约翰·卡罗尔大学神学和宗教学系：Paul Nietupski, <http://sites.jcu.edu/trs/professor/paul-k-nietupski-ph-d/>, 2013年7月29日

⁸ 约翰·卡罗尔大学：faculty interviews, <http://sites.jcu.edu/eas/pages/faculty-interviews/paul-nietupski/>, 2013年7月29日

⁹ Paul Nietupski, *Labrang Monastery: A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on the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1709-1958*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

¹⁰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ashi Rabgey, http://www.uvatibetcenter.org/?page_id=1718, 2013年8月5日；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Tashi Rabgey, <http://elliott.gwu.edu/faculty/rabgey.cfm>, 2013年8月5日

¹¹ Tashi Rabgey, dissertation: "Specters of China: Tibetan Legal Recogn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in Post-Democratization Taiwan," Harvard University. 年代不清。

¹² Tashi Rabgey and Tseten Wangchuk,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Post-Mao Era: Lesson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4) .

¹³ 芝加哥大学神学院：Christian K. Wedemeyer 简历, <http://divinity.uchicago.edu/faculty/wedemeyer.pdf>, 2013年7月29日

¹⁴ 芝加哥大学神学院：Christian K. Wedemeyer, <http://divinity.uchicago.edu/faculty/wedemeyer.shtml>, 2013年7月29日

¹⁵ Christian K. Wedemeyer, *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 South Asia across the Disciplines Se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Geoff Childs (杰弗·切尔兹) 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1987年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得人类学学士, 1998年从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人类学社会文化及生态学方向和中央欧亚研究藏学方向双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人口统计学、老龄化和现代化、应用人类学和发展、历史人口统计学。¹他的作品有《藏人转型: 从历史和当代视角看生殖、计划生育和人口统计变化》。²

Kenneth Bauer (肯尼斯·鲍尔) 是弗蒙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 社区发展和应用经济系助理教授。他1992年在布朗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 199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牧场生态学硕士学位, 2007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发展研究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中央西藏牧民们的土地使用、共同财产和发展 (1884—2004)》。³

Wen-Shing Chou (周文欣, 音译) 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 (Hunter College) 艺术系艺术史教授。她2011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她的兴趣在早期现代世界的视觉交流, 视觉与表述的关系等。Chou教授博士论文做的是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传统中的视觉地貌。⁴

Nancy G. Lin (南希·林) 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她在2000年获得哈佛大学政府学学士学位, 200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地区研究藏学方向硕士学位, 2011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佛教学博士学位。⁵Lin教授的专长为藏传佛教, 专注于早期现代的藏传佛教文化史。⁶其博士论文为《改编佛陀故事: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西藏如意树文化史》。⁷

Serinity Young (赛琳尼特·杨) 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分部研究员, 亦担任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和亚洲语言文化系兼职助理教授。她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 (Hunter College) 获得学士学位, 后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Young博士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西藏手工艺品和肖像艺术研究。⁸其作品有《妓女和密教明妃: 佛教叙述、仪轨和肖像艺术中的性行为》。⁹

Karl Debreczeny (卡尔·杜凯鹤) 是纽约鲁宾艺术馆 (Rubin Museum of Art) 馆长 (Curator)。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西藏历史和艺术史。¹⁰他的作品有《古怪的黑帽: 第十世噶玛巴的艺术视野》。¹¹

新疆学

James Millward (詹姆斯·米尔沃德, 汉文名米华健) 是乔治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在1983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 专业东亚语言和文明, 1985年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学位, 专业远东研究, 199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米华健教授的兴趣在中国和包括蒙古、

¹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人类学系: Geoff Childs 简历, http://anthropology.artsci.wustl.edu/files/anthropology/people/cv/g.childs_cv_2012_website_version.pdf, 2013年7月29日

² Geoff Childs, *Tibetan Transition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Fertility, Family Planning, and Demographic Change* (Leiden: Brill, 2008) .

³ 弗蒙特大学: Kenneth Bauer 简历, http://www.uvm.edu/~mpa/bios/cv/Bauer_CV.pdf, 2013年7月28日

⁴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艺术系: Wen-Shing Chou, <http://www.hunter.cuny.edu/art/art-history/faculty/full-time-faculty/wen-shing-chou>, 2013年7月29日

⁵ 范德比尔特大学宗教学系: Nancy Lin 简历, <http://as.vanderbilt.edu/religiousstudies/people/nancylin2013.pdf>, 2013年7月29日

⁶ 范德比尔特大学宗教学系: Nancy Lin, <http://as.vanderbilt.edu/religiousstudies/people/lin.php>, 2013年7月29日

⁷ Nancy Lin, dissertation: "Adapting the Buddha's Biographie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ish-Fulfilling Vine in Tibet, Seven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1.

⁸ 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和亚洲语言文化系: Serinity Young, <http://www.qc.cuny.edu/Academics/Degrees/DAH/CMAL/Pages/Serinity-Young.aspx>, 2013年7月29日

⁹ Serinity Young, *Courtesans and Tantric Consorts: Sexualities in Buddhist Narrative, Ritual, & Icon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¹⁰ Academia: Karl Debreczeny, <http://rmanyc.academia.edu/KarlDebreczeny>, 2013年7月29日

¹¹ Karl Debreczeny, *The Black Hat Eccentric: Artistic Visions of the Tenth Karmapa*, (New York: Rubin Museum of Art 2012) .

西藏、新疆的中央欧亚。¹他被认为是美国新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之一，其著作有《嘉峪关外：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²《丝绸之路简史》。³

Sean R. Roberts（肖恩·罗伯兹）是乔治敦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副教授，同时担任国际发展研究项目主管。他从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Roberts 教授的专长在发展理论、民主发展、媒体和发展、文化和政治、土著人权利、中亚等。他曾在 1990 年代对中亚和中国维族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⁴其作品有《东方的黎明：处于中亚和中国之间的维吾尔社会》。⁵

Dru Gladney（杜·格兰德尼，汉文名杜磊）是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人类学系教授。他在 1978 年获得威斯芒特学院（Westmont College）宗教学学士学位，1983 年和 1987 年分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⁶杜磊教授的兴趣在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上的人民、文化和政治。⁷他的著作有《中国穆斯林：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族裔民族主义》，⁸《中国的族群认同：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诞生》。⁹

Arienne M. Dwyer（安瑞恩·德怀尔）是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教授。她 1984 年获得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学士学位，1990 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专业汉语和文学，1996 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专业汉语和阿尔泰语言学。她目前亦担任堪萨斯大学人文领域数码研究所联合主管。Dwyer 教授的兴趣在语言接触和变化、数码人文、媒体档案、中国的内亚特别是新疆和青海、吉尔吉斯斯坦、语言危机和复兴、汉语、突厥语和蒙古语。¹⁰她的作品有《撒拉：内亚广泛接触过程中的研究，第一部：音韵学》，¹¹《新疆冲突：维吾尔认同、语言政策和政治话语》。¹²

Judd Kinzley（嘉德·金斯利）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 1999 年在麦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2005 年和 2012 年分别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感兴趣于中国边疆地带国家权力和自然世界的关系，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关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采矿和国家权力在新疆的扩张。¹³其作品有《矿工变为居民：晚清新疆的黄金、矿业移民和屯边》。¹⁴

Justin M. Jacobs（贾斯丁·雅各布）是美利坚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在 2002 年从华盛

¹ 乔治敦大学历史学系：James Millward, <http://explore.georgetown.edu/people/millward/?PageTemplateID=125>, 2013 年 7 月 29 日

² 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³ James Millwar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⁴ 乔治敦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Sean Roberts, http://elliott.gwu.edu/faculty/roberts_s.cfm, 2013 年 8 月 4 日

⁵ Sean Roberts, "The Dawn of the East: A Uyghur Community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in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ed. Ildiko Beller-Hann (Ashgate Publishers, 2007) .

⁶ 中欧大学：Dru Gladney, http://web.ceu.hu/sun/sun_2003/CV/dru_c_gladney_2003.htm, 2013 年 7 月 29 日

⁷ 波莫纳学院人类学系：Dru Gladney, https://my.pomona.edu/ICS/Academics/Academics_Homepage.jnz?portlet=Faculty_Profiles_and_Expert_Guide&screen=Results&screenType=next&id=7, 2013 年 7 月 29 日

⁸ Dru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⁹ Dru Gladney,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Harcourt Brace, Publishers, 1998) .

¹⁰ 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Arienne Dwyer 简历, <http://anthropology.ku.edu/~kuanth/people/cvs/2012%20CVs/DwyerCV.pdf>, 2013 年 7 月 29 日

¹¹ Arienne Dwyer, *Salat: a study in Inner Asian areal contact processes, Part I: Phonolog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7) .

¹² Arienne Dwyer, *The Xinjiang Conflict: Uyghur Identity,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5) .

¹³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Judd Kinzley, <http://history.wisc.edu/people/faculty/kinzley.htm>, 2013 年 7 月 29 日

¹⁴ Judd Kinzley, "Turning Prospectors into Settlers: Gold, Immigrant Miners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Frontier in Late Qing Xinjiang," in *China on the Margins*, ed. Paul Pickowicz and Sherman Cochr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2010) .

顿大学获得英语和文学学士学位，2005 年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关系中国方向硕士学位，2011 年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¹Jacobs 教授是一位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兴趣是多民族的中国如何在二十世纪成为汉人主导的国家。他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帝国中的帝国：新疆和现代中国。²

Justin Rudelson（贾斯丁·鲁德尔森）是达特茅斯学院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高级汉语讲师。他 1983 年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亚洲研究硕士和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族裔民族主义、中国的维吾尔族、新疆研究、跟狂躁抑郁症和精神疾病有关的医药人类学、屈原和楚辞研究、汉语教学。其著作有《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³

Stanley Toops（斯坦利·图普斯）是迈阿密大学地理系副教授。他 1979 年从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1983 年和 1990 年分别从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Toops 教授是一位文化地理学家，感兴趣于发展、文化、族裔性和旅游业。他的田野调查以新疆为主，专注于文化和发展的相互影响。⁴他曾参与编写《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疆》，撰写《新疆的生态：聚焦于水》和《新疆的人口统计》两章。⁵亦著有《1949 年后新疆的人口统计资料和发展》。⁶

清史

Nicola Di Cosmo（尼古拉·狄科兹摩，汉文名狄宇宙）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院亨利·鲁斯东亚研究教授。他在 1991 年从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现中央欧亚研究系）取得博士学位。在 2003 年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前，Nicola Di Cosmo 教授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和东亚关系史、蒙古和满洲史。⁷其作品有《古代中国和他的敌人：游牧强权在东亚史上的崛起》。⁸

Evelyn Rawski（艾薇林·拉斯基，汉文名罗友枝）是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她 1961 年获得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学士、1962 年获得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68 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和远东语言博士学位。⁹罗友枝教授和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就满洲汉化问题的辩论是美国清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她的兴趣在东北亚，其著作有《最后的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¹⁰

Pamela Kyle Crossley（帕米拉·凯尔·克洛斯丽，汉文名柯娇燕）是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系教授（Robert 1932 and Barbara Black Professor of History）。她 1977 年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方向东亚研究，1978 年从耶鲁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次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81 年获得哲学硕士（M.Phil）学位，专业历史学，

¹ 美利坚大学：Justin Jacobs 简历，<http://www.american.edu/uploads/docs/9JacobsCV.pdf>, 2013 年 8 月 3 日

² 美利坚大学：Justin Jacobs, <http://www.american.edu/cas/faculty/jjacobs.cfm>, 2013 年 8 月 3 日

³ Justi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⁴ 迈阿密大学地理系：Stanley Toops, <http://www.units.muohio.edu/geography/people/faculty/stanley-toops/>, 2013 年 8 月 4 日

⁵ Stanley Toops, "The Ecology of Xinjiang: A Focus on Water" and "The Demography of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Frontier*, ed. F. Starr (Armonk, NY: M.E. Sharpe, 2004).

⁶ Stanley Toops, "Demographics an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fter 1949" in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Working Papers*, Washington DC, No. 1, May 2004.

⁷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Nicola Di Cosmo, <http://www.ias.edu/people/faculty-and-emeriti/di-cosmo>, 2013 年 7 月 28 日

⁸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⁹ 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Evelyn Rawski 简历，<http://www.history.pitt.edu/faculty/rawski.php>, 2013 年 7 月 29 日

¹⁰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983 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¹柯娇燕教授研究清史，也研究内亚史，是新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其著作有《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²《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³

Peter Perdue（皮特·普渡，濮德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 1970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73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81 年获得历史学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⁴濮德培教授的兴趣在现代中国史、日本社会和经济史、边疆史和世界史。⁵其著作有《中国西进：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⁶

其他学者

Joanna Waley-Cohen（乔娜·威利-柯恩，汉文名卫周安）是纽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她 1974 年和 1977 年分别在剑桥大学获得中国研究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⁷她的兴趣在早期现代中国史、中国和西方、中华帝国文化。⁸其著作有《中国的战争文化：帝国与清朝军事》，⁹《清朝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¹⁰

Kwangmin Kim（金光民，音译）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Kim 教授的专长在明清史，特别感兴趣于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边疆地区和东亚世界秩序的转型。他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关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清朝在新疆的穆斯林合作者。¹¹

Benjamin Levey（本杰明·列维）是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 2000 年从米德百瑞学院（Middlebury College）获得国际政治和经济学士学位，2006 年从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获得硕士学位，2013 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Levey 教授的研究兴趣在清史和内亚史、满学研究、比较视野下的边疆。¹²

其他学者

Thomas S. Mullaney（托马斯·穆拉尼，汉文名墨磊宁）是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他 1999 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东亚研究及国际关系学士学位，2000 年从该校获得硕士学位，2004 年和 2006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墨磊宁教授曾经专注于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且为此写了专著《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¹³不过现在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改

¹ 美国历史学会：Pamela Kyle Crossley 简历，

http://www.historians.org/governance/election/2011/CVs/CROSSLEY_Pamela.pdf, 2013 年 7 月 29 日

²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³ 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⁴ 麻省理工大学：Peter Perdue 简历， <http://web.mit.edu/pasperdue/www/PerdueforwebCV2006.pdf>, 2013 年 7 月 29 日

⁵ 耶鲁大学历史学系：Peter Perdue, <http://history.yale.edu/people/peter-c-perdue>, 2013 年 7 月 29 日

⁶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⁷ 上海纽约大学：卫周安， <http://shanghai.nyu.edu/cn/about/leadership-entry/joanna-waley-cohen>, 2013 年 8 月 3 日

⁸ 纽约大学历史学系：Joanna Waley-Cohen, <http://history.fas.nyu.edu/object/joannawaleycohen.html>, 2013 年 8 月 3 日

⁹ 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I.B.Tauris, 2006) .

¹⁰ 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¹¹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历史学系：Kwangmin Kim, <https://history.colorado.edu/faculty/faculty-short-biographies-department-history#kim>, 2013 年 8 月 3 日

¹²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Benjamin Levey, http://www.ii.umich.edu/ccs/aboutus/people/faculty/ci.levybenjamin_ci.detail, 2013 年 8 月 3 日

¹³ Thomas S.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变，目前在研究中国的打字机历史。¹

Jonathon Skaff（乔纳森·斯卡夫）是宾夕法尼亚雪滨斯堡大学（Shippen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学系教授。他1982年获得日内瓦霍巴特学院（Hobart College）历史学学士学位，1992年和1998年分别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²Skaff教授目前从事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中国北部边疆的研究。³其著作有《隋唐中国和它的突厥蒙古邻居：文化、权力和关系，580—800》。⁴

相关学会

中央欧亚研究学会（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简称CESS）成立于2000年。该学会致力于通过学术会议和期刊出版增进中央欧亚研究地区学者的交流和沟通。⁵中央欧亚研究学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欧亚研究学会会议，2013年10月它将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举办第十四届会议。⁶协会定期出版《中央欧亚研究评论》（The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Review, CESR），刊出关于中央欧亚的学术研究评论、会议事件信息等。⁷该学会还与学术期刊《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保持密切合作。⁸学会的常设机构在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⁹学会2013年度新当选主席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Ed Schatz（艾德·夏慈）教授。¹⁰

美国蒙古学会（The Mongolia Society）成立于1961年，旨在促进对蒙古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学会每年会召开年度会议。¹¹该学会出版《蒙古学》（Mongol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Mongolian Society）、《蒙古学会时事通讯》（The Mongolian Society Newsletter）、《蒙古学会公报》（The Mongolian Society Bulletin）、《蒙古调查》（Mongolia Survey）、《蒙古学会报告》（The Mongolian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蒙古学会特别报告》（The Mongolian Society Special Papers）以及词典和语言学习资料。¹²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¹³学会现任会长为蒙古学家Alicia J. Campi（艾丽西亚·坎皮）博士。

美国蒙古学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旨在促进蒙古学研究的非政府、非盈利教育机构。¹⁴其资助蒙古学发展和相关学术交流。¹⁵美国蒙古学中心负责召开美国蒙古学中心年会或其它学术会议。¹⁶其常设机构有两个，一个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国立蒙古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另一个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¹⁷

¹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Thomas S. Mullaney, http://history.stanford.edu/mullaney_thomas_s, 2013年7月30日

² 宾夕法尼亚雪滨斯堡大学：Jonathan Skaff 简历, <http://webspaceship.edu/jkskaf/Scholarship/CVResearch.html>, 2013年8月5日

³ 宾夕法尼亚雪滨斯堡大学：Jonathan Skaff, http://webspaceship.edu/jkskaf/My_Research.html, 2013年8月5日

⁴ Jonathan Skaff, *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⁵ 中央欧亚研究系会：Articles and By-Laws, <http://centraleurasia.org/about-cess/articles-and-by-laws/>, 2013年7月30日

⁶ 中央欧亚研究协会：<http://centraleurasia.org/2013-call-for-papers/>, 2013年7月30日

⁷ 中央欧亚研究协会：CESR Online, <http://centraleurasia.org/publication/cesr-online/>, 2013年7月30日

⁸ 中央欧亚研究协会：Central Asian Survey, <http://centraleurasia.org/publication/central-asian-survey/>, 2013年7月30日

⁹ 中央欧亚研究协会：Contact Us, <http://centraleurasia.org/contact/>, 2013年7月30日

¹⁰ 中央欧亚研究协会：Election Results, <http://centraleurasia.org/blog/2013/05/31/2013-election-results/>, 2013年7月30日

¹¹ 蒙古学会：Home, <http://www.mongoliasociety.org/>, 2013年7月30日

¹² 蒙古学会：Publications, <http://www.mongoliasociety.org/?q=section/200706225.htm>, 2013年7月30日

¹³ 蒙古学会：About Us, <http://www.mongoliasociety.org/?q=about>, 2013年7月30日

¹⁴ 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2012年第二十一卷第三期：第96页。

¹⁵ 美国蒙古学中心：Mission, http://www.mongoliacente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8&Itemid=38, 2013年7月30日

¹⁶ 美国蒙古学中心：Academic Conferences in Mongolia http://www.mongoliacente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category&id=36&Itemid=125, 2013年7月30日

¹⁷ 美国蒙古学中心：Contact Us,

现任主席是来自史密斯索尼娅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考古学家 William Fitzhugh (威廉姆·菲兹)。¹

中央欧亚学生会 (The Association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ents, 简称 ACES) 是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学生组织。该协会负责召开每年的中央欧亚学生会学术会议 (ACES Conference), 第二十届中央欧亚学生会学术会议已于 2013 年 4 月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现任主席为 Niko Kontovas (尼克·康特维斯)。²

总结

从这篇论文中, 人们很容易发现, 美国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集中在宗教 (特别是藏学领域) 和历史 (包括艺术史)。仅有的几位从事现代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人类学界。此外, 尽管在这篇论文中已经罗列了众多中国边疆地区研究学者, 然而这还不能反映美国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的全部, 部分荣休教授如新疆学家 Linda Benson 及未拿到教授职位 (Professorship) 的学者并未得到介绍, 比如藏学家 Bryan Phillips, Lauran Hartley 以及新疆学家卡哈尔·巴拉特 (Kahar Barat)。在这篇论文中, 我也未介绍美国大学中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生。这一群体数量庞大, 而且正在并将持续为中国边疆地区研究作出贡献。然而, 由于要得到他们的具体信息还比较困难, 因此只能放弃。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http://www.mongoliacente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act&task=view&contact_id=1&Itemid=138, 2013 年 7 月 30 日

¹ 美国蒙古学中心: Board of Directors,

http://www.mongoliacente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Itemid=40, 2013 年 7 月 30 日

² 中央欧亚学生会: ACES, <http://www.iub.edu/~aces/>, 2013 年 7 月 30 日